
故宫学十年(2003~2013)

Ten Years of the Gugong Studies

李文儒

Li Wenru

内容提要：

十年磨一剑。自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先生首倡故宫学以来，故宫学的建设发展整满十年。几乎包罗万象的故宫文化、故宫学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需要“故宫学”这样一个宏大的学术概念作整体性、历史性的学术整合。故宫学术资源的无比丰富性与复杂性，全社会学界参与的可能性与积极性，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统统因为有了故宫学而纲举目张。故宫学的建设和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总的方向与目标是搭建起以故宫学为核心的学术网络结构，做到以故宫学为中心的学理、观念、氛围全覆盖，科研工作体制、机制、制度保障全覆盖，学术成果发布、国内外学术交流合作、分门别类的学术团队培养全覆盖。全面回顾和总结故宫学十年的历程，故宫学的现实价值与历史意义历历在目。故宫博物院同仁的奋发与社会学界的积极参与，特别是一些标志性的大学与国家研究机构纷纷与故宫博物院联合开展故宫学教学与研究，培养故宫学方向的学生，培养故宫学研究的后备力量，是故宫学足以成为学科，甚至是已经成为学科的确证。可以确信，在以“故宫”为历史参照标志的帝制政体、帝制文化、帝制学术的现代转型的大历史趋势下，故宫学研究一定会由学术自发经学术自觉而达学术自信、自强之境。

关键词：

故宫学 十年历程 学术观念 科研体制 学科建设
学术自强

ABSTRACT:

It's been a decade since Mr. Zheng Xinmiao, the former director of the Palace Museum (tenure 2002-2012), initiated the academic campaign of "Gugong Studies".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the academic research of the imperial palace which are almost all-encompassing are bound to be integrated into an encyclopedic discipline such as the "Gugong Studies" at certain stage of their development. The unparalleled abundance and sophistication of the academic resources about Gugong (the old imperial palace), the potential and active participation from the entire academia,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m all benefit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Gugong Studies".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Gugong Studies" are systematic. The general objective is to build an academic network structure centering on the studies of the old imperial palace. Specifically, they are the full coverage of disciplinary methodology, concept, and environment centering on the "Gugong Studies", full coverag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mechanism, operational system, and th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and full coverage of academic publicatio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and advanced education of various professionals. Looking back upon the ten-year development of the "Gugong Studies" in an all-round manner, we find both i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historical value. The fact that the academic effort made by the Palace Museum staff,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social academic groups, particularly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Museum and prestigious universities and national research organizations for joint-training programmes for "Gugong Studies" majors, is exact evidence for the "Gugong Studies" to become or even have become a true discipline. It is believed that at the transition of times, with the imperial palace as the sole historical reference of the imperial political system, the imperial culture, and the imperial academic researches, the study of it, or the "Gugong Studies", must evolve from a spontaneous academic activities, through self-conscious academic activities and eventually to a systematic and confident stage.

KEY WORDS:

Gugong Studies, ten years of development, academic concept, scientific research mechanism,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一 从故宫学之提出看故宫学之要义

2002年9月，郑欣淼先生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的身份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一年之后的2003年10月，郑欣淼院长第一次向社会正式、明确地提出“故宫学”这一学术概念。

其时我正协助院长分管全院的学术研究工作，对院长提出的故宫学，我当时的直感是豁然开朗，意兴无穷，并意识到此举在故宫博物院学术史上，无疑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但同时又不免心存好奇：郑院长上任一年就有此重大创举，这想法到底是怎样萌生的？故宫学为什么不是在故宫博物院的学术会议或工作会议上提出，而是在南京博物院庆祝建院70周年的博物馆论坛上提出？

在私下的交谈中，我肯定向院长问过这样的问题。不管院长谈到过没有，我断定这两个问题一定与三件事相关。

一与南京有关。

在南京，在南京博物院的学术会议上首次提出故宫学，首次做关于故宫学的讲演，在提出者本人，当然不会对提出故宫学地点的进行刻意选择，但正是这一偶然巧合，却给故宫学的提出平添了许多象征、寓意的色彩。

南京是什么地方？就在距郑欣淼先生提出故宫学不远的地方，是明初南京故宫的遗址。朱元璋建立的南京紫禁城，是朱棣建立的北京紫禁城的原版，是已有近600年历史的北京紫禁城的直接源头。作故宫学讲演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他正是在明清故宫的源头，为故宫学术研究找到并确立了“故宫学”这样一个大的、总的学术源头。

南京博物院是什么地方？南京博物院的前身是中央博物院。1933年4月，蔡元培倡议，国民政府教育部设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1936年4月，成立了中央博物院第一届理事会，由教育部会同中央研究院聘请蔡元培、王世杰、胡适、朱家骅、张道藩、翁文灏、傅斯年等13人为中央研究院理事，蔡元培为理事长，傅斯年为秘书。而蔡元培是1925年故宫博物院建院时的第一任董事，1928年，蔡元培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故宫博物院理事，1934年被任命为理事长。王世杰、朱家骅、傅斯年则均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故宫博物院理事，翁文灏还出任过故宫博物院的理事长。中央博物院的主体收藏为清代热河、奉天两处行宫的20多万件文物，与故宫博物院藏品一样，大都是清宫遗留。1948年5月至6月间，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与故宫博物院在新落成的中央博物院陈列室举办了联合展览，这也是该院举办的第一个展览。从组织管理到藏品到展览，两院关系异常密切。

同样距故宫学提出地不远的南京朝天宫，东侧曾是因抗日战争故宫文物南迁而建立的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故宫南迁文物保存库，坚固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外形，仿清宫承德避暑山庄外八庙中的须弥福寿之庙的大红台而建。1937年1月至8月，1946年至1949年，先后两次存放故宫南迁文物13427箱又64包，总数多达百万件，至今仍有2211箱存放其中。就是在这个地方，故宫南迁文物分为两部分，其中的一部分辗转到了台湾，因此有了后来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另一部分回归北京故宫，形成了北京、台北两个故宫博物院并存的格局。在这样一个地方第一次提出故宫学，最能牵动太多的故宫历史故事，太多的故宫历史际遇。

二与故宫博物院的一次展览有关。

在我的印象中，郑欣森先生不只一次说过，他的故宫学想法的产生，最早和参观故宫博物院的一次展览有关。他说的那个展览是故宫博物院于1999年举办的“清代宫廷包装艺术展”。那时，他在国家文物局，我在他领导下的中国文物报社。由于工作的关系，他到各地博物馆看过的展览当然太多了，但故宫的包装展却引起了特别的关注。看过这个展览，他居然写出3000多字的《我看“清代宫廷包装艺术展”》的文章给我，发表在《中国文物报》上。文章后半部分从文博工作的角度谈了从这个展览中得到的三点启发，首要的一点就是要举一反三，全面科学地理解文物的内涵，深化对文物的认识，扩展文物的概念¹。这一启发针对的是以往由于认识上的误区，往往把文物与包装分割开来，不把包装算作文物而另行处置的现象，包括许多器物用名贵材料做的套匣、托座都另行处理了。记得到故宫博物院后，有一次随郑院长一起查看库房，就看见过不少紫檀、花梨、楠木做的造型工艺极精致的大小不等的器物底座堆放在角落里，早已无法与原器物对上号了。院长当时就说起那次包装展，说到器物与包装、套匣、托座不可分割的文物的整体性，随后又在正式的会议上强调这一问题，并由此谈到故宫文化的整体性问题。

三与首次访问台北故宫博物院有关。

2002年、2003年之交，郑欣森先生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不到4个月，就实现了访问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愿望。此次访台系台湾中国时报邀请，其时我还在中国文物报任职，故亦应邀随行。2002年最后一天，郑院长赴台北故宫博物院，与时任院长的杜正胜先生会谈，会谈后参观了展览，还到地下库房看了所藏书画和清宫档案。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居然看到了排列得整整齐齐的北京故宫南迁文物的包装箱。第二天，2003年的第一天，《中国时报》在《当故宫遇见故宫 两岸故宫历史性一刻》的通栏标题下，对两岸故宫博物院的院长会见作了详细的图文报道。报道中说：“由于故宫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北京与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的相见，象征着两岸文化交流史上历史性的一刻”；“郑欣森是迄今大陆来台访问文化官员中层级最高的一位。两位故宫博物院院长见面，学历史出身的杜正胜与学文学出身的郑欣森，对于两岸学术交流合作都表示同意与赞许”。也是在这一天，已经82岁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前院长秦孝仪先生设宴招待郑欣森院长，并由此开始了同是诗词大家的秦、郑两位之间的唱和往来，此是后话。秦孝仪先生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成立后的第二任院长，从1983年至2000年，任院长长达18年之久。郑欣森先生同一天内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新、老两位院长的见面，是故宫博物院有史以来两岸故宫博物院院长的第一次正式会见²。

一说起郑欣森先生首倡故宫学，我就会想到以上三件事。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故宫学提出的诱因，正是这类事情使他萌生了故宫学的想法并逐渐成熟。当然成为诱因的事情很多，只不过这三件事与我有些直接的关系，给我的印象深一些，而且，我觉得这三件事分别从不同的侧面隐含了或者说象征着故宫学的诸多要义。比如在南京提出故宫学这件事，就让我们想到仅南京一地就和故宫有那么多重大的关联，故宫的涉及面真的是太大了，太广了，所以故宫学绝不是故宫博物院内部的事，绝不是一个部门一个专业的事。比如由看故宫博物院的一个包装展览，引发了对故宫文物内涵与重新定位的思考，当然也包括对拓宽所有文物的内涵与概

1 该文后收入郑欣森著：《紫禁内外》，第196页，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

2 详见郑欣森：《我所经历过的两岸故宫交流》，《紫禁城》月刊，2013年第2期、第3期。

念的深入思考,进一步引发了对文化遗产价值、文物价值、故宫文化价值的深化认识,重新认识,以及由此而来的对故宫学术及对故宫这门学问的深化认识,重新认识。比如从北京、台北两个故宫博物院的关系,联系到台湾海峡两岸关系,再联系到以更大的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视野,思考故宫文化和学术的意义与价值,就会发现一个更大更新的广阔天地。

当然并不是有这样一些诱因,产生这样一些想法就可以提出故宫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太容易了,谁都有可能提出故宫学这样的重大问题了。关键在于不仅要善于发现问题,抓住这些问题不放,还要举一反三,探访调查,深追细究,善于发现更多的问题,思考更多的问题,使这些问题不断地发酵,并寻找相互间的关联,寻找有可能有效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途径。也就是善于把零散的想法碎片,连缀成不可分割的整体系统,把一般的实际工作提升为理论思考、理论研究,把许许多多的问题和想法研究为学问,上升为学问¹。

如前述三件事所略略显示的那样,面对如此悠久、如此厚重、如此庞大、如此丰富的故宫,如他在《探索故宫学的体会》中所说,一来到故宫,就感到要对学术研究引起重视,这是关系到故宫博物院长远发展的大事。从做研究做学问的角度着眼,从宏观的角度着眼,实在需要为故宫的文化,为故宫的学术研究,找到并妥当安放一个既提纲挈领的,又有很大覆盖面的学术支点,承担起统领的作用、组织的作用、号召的作用、动员的作用,使有关故宫研究的方方面面,有一个指向,有一个依归,有一个统辖。于是,在郑欣淼先生那里,故宫学这样一个学术概念、学术口号、学术旗帜就应运而生了。事实上,不管是提出者的愿望,还是学术界的迅速响应,一致认同故宫学最核心的最鲜明的特征是它的整体性与开放性。故宫学把包罗万象的故宫文化、故宫学问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文化整体、研究对象来看待。故宫学的提出,是全面理解故宫文化,整体把握故宫内涵的一次历史性学术整合。故宫的历史,故宫的建筑,故宫的门类齐全存量巨大的藏品,与故宫有关的种种人、事、物,故宫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各自的系统性与整体性——故宫学术资源的无比丰富性与复杂性,全社会学界参与的可能性与积极性,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统统因为有了故宫学而纲举目张。

由此看来,郑欣淼院长虽然上任不到一年就有此振聋发聩之声,但这绝不是突发奇想,心血来潮,而是深思熟虑,胸有成竹,水到渠成。可是,上任一年就提出如此重大的问题,毕竟让人觉得太快太神了,一定还有其他的原因。这个原因,郑欣淼先生在《探索故宫学的体会》的讲演中透漏了:

我在20年前是从事政策学研究工作的。我曾在一个省的政策研究室工作过15年,主要搞调查研究,为省委决策服务。在第10年的时候,我想搞了这么多年的政策研究工作,体会很多,也读了不少书,主要还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便决心写一本政策学,那是在80年代中期,以后写出了《政策学》,80年代后期出版。在当时来说,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最早的一批政策学著作之一。《人民日报》、《中国图书评论》等报刊都曾发表评论文章,给予了肯定。政策学以后有了较快发展,这方面的专著也不断涌现。但我感到架构一个学科的框架是很不容易的。虽费了很大的劲,但还是受到

¹ 郑欣淼院长在2005年5月27日故宫博物院第一期学术讲座的讲演中较为集中地讲到这一过程。该讲演后以《探索故宫学的体会》为题收入《故宫与故宫学》一书,第326页。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

当时个人学识等方面的限制,有很多不足之处,有明显的时代烙印。现在我进行故宫学的研究,就很容易联想起以前这件事。故宫学是博大精深的,对我来说,进行故宫学研究比当年的政策学研究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我对故宫了解又不是很深,加之自己的精力也不如以前,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我知道,故宫学研究我们只是开了一个头,光靠我们是不行的,它的深化要靠大家,靠社会。¹

从政策学到故宫学,郑欣淼先生让我们从个人学术史的角度,找到了他上任一年就能提出故宫学的学术研究的线性逻辑关系。做政策研究工作,写出《政策学》;领导故宫博物院,研究故宫,提出故宫学。可见,故宫学的提出,是他长期学术准备、学术积累、学术历练的结果,是他这位既长期从事实际工作,又长期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学者型领导、领导型学者所特有的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学术智慧、学术力量的一次精彩呈现。

二 从《故宫学述略》到《故宫学概论》

提出故宫学这样一个学术概念,举起故宫学这样一面学术旗帜,固然已经是很重要的学术贡献了,但更重要的是建设故宫学。郑欣淼先生既是故宫学的首倡者,同时又是故宫学身体力行、身先士卒的建设者。

郑欣淼对建设故宫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为故宫博物院这样一座全世界著名的超大型博物馆建立起管理工作与学术研究的新型关系。博物馆越大,资源越丰富,越需要相应的学术支撑,越需要构建厚实的学术平台,所谓的学术立馆就是这个意思。从事专业研究的人员明白这个道理,但从事管理工作和其他业务工作的人就不大容易明白这个道理。如果不是一院之长提出故宫学,而是一位专业研究者提出故宫学,即便是一位极有造诣的学者提出,其影响很有可能也就局限在专业研究的圈子里;但现在却是全面领导故宫博物院的“一把手”提出来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在博物馆科学管理体制体系比较成熟的情况下,馆长的选择与作用主要决定于执行力,而在博物馆科学管理体制体系建立之前或正在探索建立之时,一馆之长的作用被极度放大,馆长对博物馆的影响几乎是决定性的,馆长的创意及其价值与执行力相比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亦即馆长的领导思路与工作思路对博物馆的整体工作起着决定性作用。

放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看,情形就非常清楚了。作为故宫博物院院长,提不提故宫学,并不是对院长的必须的工作要求,甚至并不在院长的工作范畴之内。郑欣淼院长能够提出故宫学,是因为他把他的工作作为研究的对象,是以研究的心态、研究的思路、研究的方法才提出来的。一旦提出,又立刻受到各方面的认同,对实际工作产生了积极影响,反过来,更坚定和强化了以故宫学为指导,以研究的心态,研究的思路,研究的方法,开展具体的工作。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行为,作为院长,他自然而然地会要求各级领导,全体员工,以故宫学为统领,把各自的工作作为研究的对象,以研究的心态,研究的思路,研究的方法开展工作。虽然

¹ 《故宫与故宫学》,第347页,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

不可能一呼百应，也不可能方方面面能够迅速跟进，但至少在很快的时间里，在全院范围内，传递、灌输了一种新鲜的学术观念，形成了浓厚的学术氛围，开创了研究和工作的新型关系。也就是说，因为他是院长，他可以把他自己长期以来养成的工作作风和学术研究风格——工作内容即研究对象，以研究态度从事具体工作，以研究成果指导具体工作，从而提高工作效率，提升工作质量，同时也提升学术研究的质量，凸显学术研究的特色——推及全院。这对于一个文化资源、学术资源无比丰富的文化机构来说，对于一个以文化学术研究与传播为己任、以文化学术传播为公众为社会发展服务为己任的文化机构来说，真是太重要了，太必要了。完全可以想见，如果没有这样的倡导、要求和推广，实际状况肯定是大不一样的。

还是和具体工作结合起来说说吧。故宫学的鲜明特征是它的整体性。故宫博物院依托的建筑空间是明清遗留的皇宫，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以清宫遗留为主，故宫博物院的首要任务是保护文化遗产。2004年编制上报的《故宫保护总体规划大纲》的核心理念与重要内容就是“完整保护，整体维修”。把故宫学渗透到保护研究和保护工作中，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这些年来鲜明地提出和反复地强调整体保护、完整保护的核心理念，并成为故宫内外的共识。用整体保护、完整保护的理念总结故宫博物院建院以来建筑管理、藏品整理的得失经验，从研究的层面深入认识完整保护、整体保护的意义和可能，不论不可移动和可移动的故宫遗存现在所属何处，均从故宫学整体性的学理层面找到应当的归属，同时也为有可能不断实现的完整性保护创造理论依据。

故宫学的完整性、整体性要义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馆藏文物的理解与认识。大规模的彻底的院藏文物清查的结果，是将多年来90多万件的藏品数字改写为现在的180多万件。这么巨大的变化绝不是数字游戏，其中包含着如何看待故宫文物的反复研究、反复讨论。故宫博物院的收藏以清宫皇室收藏为主，皇家所有变为全民所有，这是激烈的社会革命带来的化私为公的所有权的巨变。放眼世界博物馆的收藏历史，由皇室收藏、家族收藏、个人收藏转化为博物馆收藏是普遍的规律。在这个转化过程中，家族、个人捐赠是最常见的方式。故宫博物院藏品除皇家遗存外，另有相当数量的重要藏品为个人捐赠，为铭记弘扬这种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特选择故宫内的景仁宫设立捐赠馆，设立捐赠榜，凡捐赠者均榜上有名，并轮流陈列捐赠文物。以收藏古代文物为主的故宫博物院要不要收藏现代艺术品？要不要有选择地接收当代艺术家的捐赠？这些问题一直争议不断，最终还是在故宫学的完整性、整体性、延续性的学理层面获得解决：一是应当建立从古到今的连续不断的藏品系列，展现从古到今的传承创新的历史进程；二是继承和弘扬捐赠精神，奉献精神。有这两条理由，就足以统一各方面的意见了。

以上只是从故宫学的完整性、整体性要义出发，用两个方面的例子，说明故宫学在实际工作中所起到的明显作用。还有如举世瞩目的故宫大修，以故宫学的视野，提出在大修实践中创造和完善东方古代木构建筑修缮保护规范标准，遇到问题和争议，通过举行国内国际学术会议讨论解决。吸取以往宫殿建造与修缮缺乏详细记录的教训，更为以后的保护修缮留存充足的研究参考资料，规定每一处修缮规划方案，必须安排撰写大修报告的任务。再有建立和规范展览与学术研究的互动关系，充实展览图录的文化学术含量，提高内外展览水平，等等，均是故宫学提出后出现的新气象。

郑欣淼院长建设故宫学另一方面的贡献，是带头研究，不断推出研究成果，为故宫学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从学术角度看，这是最主要的贡献。

故宫学提出不到一年时间，郑欣淼先生就撰写出近四万字的《故宫学述略》，2004年10月发表在由他提议创办的《故宫学刊》创刊号上。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写出这么长的全面论述故宫学的大文章这件事，也足以看出他提出故宫学是一个深思熟虑的过程。

《故宫学述略》共分四部分：1. 故宫学的研究领域；2. 故宫学的研究历程；3. 故宫学的提出及其发展机遇；4. 故宫博物院在故宫学研究中的责任和举措。在第1部分里，将故宫学的研究领域归纳为6大板块：1. 紫禁城宫殿建筑群；2. 文物典藏；3. 宫廷历史文化遗存；4. 明清档案；5. 清宫典籍；6. 故宫博物院院史。这部分从横的方面把涉及很广的故宫学研究内容划分为六大块，虽然每一块的内容仍然十分丰富，但从总体上看，这样的划分，把本因涉及面太大而不易把握的故宫学的研究领域表述得既全面精要，又清晰明了。其余三部分则主要是从纵的方向，从故宫学研究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学术史的角度，为故宫学找到了历史的依据与基础、现在的机遇与使命、未来的走向与前景。《故宫学述略》以纵向的学理逻辑关系与横向的学术研究范畴，建立起令人信服的既覆盖广阔又脉络清楚的故宫学的学科框架结构，从而成为故宫学的奠基之作。

以此为基础，为出发点，郑欣淼的故宫学研究，以继续撰写研究文章和学术讲演，以及媒体访谈、学术对话等不同方式，向不同的方位深入开掘。从此以后，不只故宫人，整个文化界、学术界，都能经常看到郑欣淼先生关于故宫学研究的种种成果了。在仅仅五年之后的2008年、2009年之交，竟然辑成四部专著出版：《天府永藏——两岸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概述》、《故宫与故宫学》、《紫禁内外》、《守望经典》。成果之频繁，之丰富，与其上任一年就提出故宫学一样令人惊叹。

这四部专著中的《天府永藏》，是对他划定的故宫学研究领域六大板块中的第二板块——文物典藏的研究专著。

这部专著与他任院长职后立即主持制定的2004年到2010年长达七年的彻底清理清点院藏文物的规划与执行直接相关，甚至就是彻底清理清点工作的一部分，所以也是如何处理具体工作与故宫学术研究关系的一个范例。

对这部专著的写作与价值，我做过如下的评价——

清理清点工作在顺利进行着。郑院长说，他发现其中有不少问题80年来没弄清楚，也没说清楚，有些问题不只是清理清点的问题，更是关乎故宫文化整理、学术研究的重大问题。他说他要写点东西，引起大家重视、探讨。没过多久，院长说，写了三万多字了，是篇大文章。又没过多久，院长说，七八万字了，还是挡不住，很兴奋的样子。再后来，见他忙着找资料，找人谈，找老先生、找专家一次又一次地审读他的文稿。眼望着院长是下大工夫了。院长说，集中了大家的智慧和力量。结果成就了25万字的《天府永藏》。

这部著作是作为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包括历任院长在内，80年来第一次全面盘点故宫文物，第一次详尽比较北京、台北两岸两地两个故宫博物院的藏品。由于经历了从明清两代皇宫到博物院的历史巨变，经历了从一个博物院到两处博物院的变迁，虽是一部盘点整理故宫文物的专著，却具有巨大的历史容量。从第一、二章关于皇宫文物数百年来的聚散流迁中，足以真切地感知其间历史

的面影。第三、四、五章是全书的重点，分述两岸两院藏品的动态，把两院藏品分为12个类别，清点比较各自的来龙去脉，各自的特点特色，多少有无，将同源分流、庞大繁杂的故宫文物梳理得清清楚楚，关于两个故宫博物院文物的所有疑问，几乎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

更有价值的是，本书不是一般的资料梳理，不是公布文物的清点账目，而是研究型的文化整理，是清理文物的研究，其意义远超出文物藏品清点的范围。明显的特点有三：一是客观、准确。以大量第一手材料为依据，实事求是地建立起一个故宫、两个故宫博物院根根脉脉、根脉相连的文物文化谱系。二是大历史大文化的文物视野。除传统的书画、陶瓷、玉器、青铜器等外，更重视发掘更具宫廷特色的宫廷类、宗教类、建筑类文物的历史文化价值。如宫廷类文物，就梳理出帝后玺印、鹵簿仪仗、宫廷服饰、科学仪器、戏曲、医药、地毯等16类。三是体现着作者本人首倡的“故宫学”研究的整体性。虽然主体是可移动文物，但始终置于与不可移动之紫禁城的关系、与宫廷历史文化艺术的关系的框架之中，即置于以“故宫学”为标志的故宫文化整理与研究的整体中。因此，《天府永藏》不仅为读者清晰地解析了故宫藏宝，更能从历史文化艺术的视角，而不是从所谓藏宝的视角引导人们看待最引人注目的故宫珍藏，从而真正理解“国宝”对于国家、民族、人民及对于世界的意义¹。

正是基于以上理由，我把《天府永藏》看作是郑欣淼故宫学专项研究的代表作，当然也是故宫学研究的一个学术范本。

郑欣淼先生对故宫学研究仍孜孜不倦。最新的也是最重要的成果是《故宫学概论》。只需把这部专著的目录列出来就足以看出它的分量了——

上 编

第一章 故宫学基本内容及其价值、意义

第二章 故宫学产生的依据、基础与机遇

第三章 故宫学的建设与发展

第四章 故宫建筑与明清宫廷建筑

第五章 故宫文物的来源、存藏与流散

第六章 故宫与博物院

下 编

第七章 故宫宫廷历史文物及其研究

第八章 故宫古代艺术珍品及其研究

第九章 故宫图书及其研究

第十章 故宫明清档案及其研究

¹ 《紫禁城》，2008年第9期。

第十一章 故宫与明清宫廷史研究

第十二章 故宫建筑研究与完整故宫保护

第十三章 故宫博物院研究

如果说《故宫学述略》是故宫学的奠基之作,《天府永藏》是故宫学研究的典范之作,那么,《故宫学概论》就是故宫学的成就之作。《故宫学概论》是一个标志,是一个阶段的总结,又是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从十年前故宫学的提出,到十年后的《故宫学概论》,真的是十年磨一剑。十年前提出故宫学,引领故宫学从一个新的概念出发;十年后完成《故宫学概论》,则引领故宫学从一个学科的基地再出发了。

一位领导着、负责管理着故宫博物院这么大一座全世界瞩目的博物馆的院长,居然在短短的十年时间里能有如此重大的学术创新和学术贡献,除了对自我价值实现的证明之外,更持久的作用与力量,是对故宫博物院学术研究的激励、鼓舞与引领,是对所有对故宫学研究感兴趣者、参与者的激励、鼓舞与引领。

三 从《故宫博物院院刊》、《紫禁城》改版扩版到《故宫学刊》

郑欣淼先生是2002年9月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我是应院长之约于2003年7月到故宫博物院工作的。除了协助院长分管科研等工作外,还兼任了紫禁城出版社社长、《故宫博物院院刊》主编、《紫禁城》杂志主编。至今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我到任之初,正式办公室还没安顿好,院长到我的临时办公室来了。记得好像是第一次到我办公室。院长手里拿着两本刊物,也没说几句话,把两本刊物往我办公桌上一撂,笑眯眯地留下一句“你看着办吧”就走了。我一看,这两本刊物都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办的,一本是《故宫学术季刊》,一本是《故宫文物月刊》。学术季刊很素雅,纸张印制均好;文物月刊全彩印,我比较熟悉,来故宫博物院前,我主持中国文物报社,把《文物天地》改扩成一本全彩印的文物文化、文物艺术月刊时,就拿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月刊说过事儿。看着院长留下的两本刊物,琢磨着院长留下的那句话,我突然回过味儿来,怪不得院长执意要我兼任院里主办的两种期刊的主编呢,几次推辞都不应允。

我明白院长的意思,他是希望我把我们院里的两本刊物办得至少不比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两本刊物差;还有,隶属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紫禁城出版社的出版物,在人们的眼里,也有个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出版物的比较。后来想,虽然那时郑欣淼先生还没正式提出故宫学,但肯定正在最后的酝酿中了,因为在这之后的两个月他就提出来了。而故宫学的宣传推广、建设发展,与故宫博物院刊物的编辑,与图书的出版发行的关系之密切、之重要,自是不言自明的事。

我接管的《故宫博物院院刊》和《紫禁城》这两种期刊,在中国约上万种刊物中,算是资历较长的,在行业内也是很有影响的。当然,和故宫的文化学术资源相比,发展的空间还是很大的。《故宫博物院院刊》已是双月刊,又是纯学术刊物,一下子不可能改动过大,主要从三个方面作了努力:一是实行严格的编委、专家学者匿名审稿制,确保质量;二是适当扩大开本,增加页码,增加容量;三是提升设计印制质量,邀请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作平面设计研究教学的赵健先生作总体设计(包括《紫禁城》),并根据故宫学术研究成果

图像比较多的特点，选用适合的优质纸张，改黑白印制为全彩色印制。至少在形式上，这样的变化在学术期刊中是独树一帜的。有趣的是，改扩版后的《故宫博物院院刊》出现在三联书店的售卖架上，有朋友告每期他都买，但我知道他并不是研究文物的，问其故，他说主要是因为看着有品位，养眼。《紫禁城》当时是季刊，且每期只有52页，部分彩印，可改动的空间大，改扩版的动作就更大些。做期刊的都知道，刊物的任何变动均需在前半年办理好所有报批手续，而我们的改版扩版决定已是八九月份，按常规肯定来不及了，不过我有过报纸刊物改扩版特事特办的经验，需要的手续很快就补办齐了。

到编辑定稿、正式出刊的时候，郑欣淼院长的故宫学已经提了出来，改扩版的方向更加明确了。我在改扩版后的《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1期的卷首作了如下说明：

《故宫博物院院刊》是故宫博物院主办的学术双月刊。

本刊自1958年创办以来，即以深入发掘故宫博物院丰富的文化内涵，努力推进中国宫廷学术研究、明清历史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及博物馆研究为己任。以鲜明的学术特色和长期的学术坚持，以国内外、院内外专家学者发表的数千篇论文，受到学术文化界的欢迎和重视。

故宫博物院已经启动有史以来最大的紫禁城全面维修工程，至2020年紫禁城落成600周年时完成。2005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旗帜鲜明地提出故宫学的构想，呼吁和倡导举全院之力、社会之力推进故宫文化学术的整理和研究。为此，本刊从2004年起改版扩版，在增强古建维修研究、文博科技研究、宫廷遗存、史料典籍档案抢救整理研究内容的同时，考虑到本刊图像资料较多的特点，在纸张开本上加以调整，并由黑白印制改为彩色印制，由96页扩为160页。

改扩版后的第二年，适逢故宫博物院建院80年大庆，也是紫禁城建成585年，《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5期破例做了一起特大专辑。我在卷首也作了说明：

拥有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最精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是故宫博物院最为鲜明的特色。今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80周年，紫禁城建成585周年，紫禁城学会成立10周年，因此故宫博物院、紫禁城学会邀请中外学者召开“中国明清宫廷建筑国际学术研讨会”，为配合此次研讨会，集中展示故宫特色研究成果，本刊首次推出古建筑研究专辑。

此次研讨会规模空前，论文数量多，本专辑特由往常的160页增扩为379页，以此作为本刊对故宫博物院80周年的纪念。

与《故宫博物院院刊》的变动相比，《紫禁城》由季刊改为月刊，则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努力过程。与《故宫博物院院刊》发表规范的学术论文不同，《紫禁城》定位于面向社会、面向公众，传播故宫的学术、文化、艺术，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故宫文物月刊》类似，从服务对象的角度看，更能体现博物馆文化的要求；而

在研究、传播故宫学方面，则与院刊完全一致。我在改版后的2004年第1期卷首的《〈紫禁城〉改扩版》中，重复了在院刊卷首对院刊与故宫学之关系那样的表述，说明了《紫禁城》与故宫学的关系，并特别强调了《紫禁城》的社会性、公众性，亦即强调了故宫学的社会性、公众性——

从本期始，本刊改扩版。季刊改双月刊，每期52页扩至132页，部分彩印改扩为全彩印。

首都北京是座古老的都城。古城正中有皇城，皇城正中有宫城。皇城原状基本上消失了，宫城完整地保留着，这就是举世瞩目的紫禁城。紫禁城近600年的历史，明、清24帝的历史，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持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100多万件套宫廷遗留文物，以及故宫博物院成立近80年的历史，积淀为深厚博大的故宫文化、故宫学。

200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80年。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森在迎接建院80年之际，旗帜鲜明地提出创建故宫学的构想，呼吁和倡导举全院之力、社会之力推进故宫文化学术的整理研究。故宫博物院遂决定《紫禁城》改扩版，并决定2005年建院80年时继续改扩，由2004年的双月刊改为月刊。

植根于故宫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本刊无论怎样改扩，解读故宫、发现故宫的宗旨是不会变的，开发和传达故宫文化、故宫艺术的宗旨是不会变的，只不过是开掘得更深入些，更丰富些，在传达的方式方法上与读者贴得更近一些。

如紫禁城这座传统文化的最大的最后的城池早已四门洞开、吐纳八面来风一样，《紫禁城》杂志努力用研究成果社会化、学术问题趣味化、专业活动大众化、传统文化时尚化的方式，在更广泛的层面，通过更多的渠道，与读者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与读者一起，从不同的路径自由地进出故宫，从各自的角度仔细地打量故宫。

2004年是甲申年。故宫博物院正在举办“清代宫廷珍藏如意展”。本期特别推出“故宫如意大观”专题，也借此期望读者如意，编者如意。

《紫禁城》继续扩展。我在2005年第6期卷首的《〈紫禁城〉再改扩版》中写道——

本刊2004年第1期改扩版号，我写过这样的话：“从本期始，本刊改扩版。季刊改双月刊，每期52页扩至132页，部分彩印改扩为全彩印。”这话当然当下就兑现了。

还说过这样的话：“2005年故宫博物院建院80周年时继续改扩，由2004年的双月刊改为月刊。”这话肯定说过头了，2005年本刊还是双月；但也不完全是空话大话，虽没改成月刊，但每期页码差不多翻了一番，而且，上一期做了特大号的“80年”纪念专号，算算总账，和改为月刊的总量差不了多少。

不过，从明年开始，即从下期开始，“80年”院庆年一过，本刊就真正改为月刊了。编排内容与形式也会有一些变化，封二的“预告”可略见一二。但大方向是不会变的。所以仍然可以重复说

过的话：

“植根于故宫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本刊无论怎样改扩，解读故宫、发现故宫的宗旨是不会变的，开发和传达故宫文化、故宫艺术的宗旨是不会变的，只不过是想开掘得更深入些，更丰富些，在传达的方式方法上与读者贴得更近一些。

“如紫禁城这座传统文化的最大的最后的城池早已四门洞开、吐纳八面来风一样，《紫禁城》杂志努力用研究成果社会化、学术问题趣味化、专业活动大众化、传统文化时尚化的方式，在更广泛的层面，通过更多的渠道，与读者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与读者一起，从不同的路径自由地进出故宫，从各自的角度仔细地打量故宫。”

看得出来，《紫禁城》是在努力从故宫文物文化、故宫文物艺术的层面，在努力走向社会、走进公众的方向上推进故宫学建设的。

2006年，《紫禁城》终于改成月刊了，如院长两年前放在我办公桌上的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月刊那样。

2007年，《紫禁城》再扩版，由每月每期的112页扩为每月每期的224页。刊期虽未变，内容量又翻了一番，成为当时琳琅满目的期刊中容量最大，设计、材质、印制最考究最精致的月刊之一。

如果说《故宫博物院院刊》、《紫禁城》是在故宫学的倡导引领下一步步地走向丰富，走向厚实的话，而《故宫学刊》则是故宫学直接催生，直接为故宫学研究服务，为故宫学学科建设服务的。

《故宫学刊》是郑欣淼院长倡议创办的。他在提出故宫学，督促我改革《故宫博物院院刊》、《紫禁城》的同时，就提出了创办《故宫学刊》的倡议和要求，并主动担任编辑委员会主任，让我担任主编。我一听就来劲了。对于故宫学来说，创办这样一个名号直接而响亮的故宫学学术刊物太必要、太重要了。我立即组织力量开展编辑工作，郑欣淼院长也亲自撰写了《发刊词》：

在2004年岁末，《故宫学刊》第1辑和读者见面了。

故宫博物院即将迎来建院80华诞，故宫学研究也从滥觞、发展到今天蔚为大观，走过了近80年的历程。明确提出故宫学的概念并加强故宫学的建设已水到渠成。这是故宫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标志着故宫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由自发到自觉的阶段。

故宫博物院办有学术性刊物《故宫博物院院刊》及以发掘展示中国宫廷历史文化为核心内容的文化艺术性杂志《紫禁城》，现在又创办《故宫学刊》，它的任务和宗旨是什么？一句话，是为故宫学研究及故宫学的建设服务。

《故宫学刊》是个大型的学术性刊物，暂拟每年出一期，主要刊登两方面的文章：一是故宫学研究的成果。它鼓励创新，支持探索，重视为中青年学者创造条件，也为一些有见地的篇幅较长的论文提供园地。二是关于故宫学学科建设的研究，包括学科性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等各个方面，欢迎争鸣和探讨。学术发展及学科建设有其自身规律，不能急于求成，需要一个过程，绝非朝夕之功，而要长期的积累。《故宫学刊》反映的就是这个过程中跋涉的足迹，积累中的一砖一石。

故宫在北京，故宫学人在故宫学研究中具有特殊作用，应当作出更大的贡献。1929年10月，经过多年的纷乱，刚走上正轨的故宫博物院即创办了《故宫周刊》，该刊介绍院藏各类文物及古建筑，并刊登专著、考据、史料、校勘、目录等，易培基院长在“发刊词”中说：“是此一周刊之微，他日者或将谓吾国文艺复兴之权舆，亦奚不可，斯又岂独本院本刊之幸哉？”这反映了故宫博物院在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故宫周刊》后因战争原因，出到510期被迫停刊，但刊物所体现的故宫学人的精神和抱负，则成了宝贵的遗产被继承下来。《故宫学刊》流淌着《故宫周刊》的精神血脉。

期盼着故宫研究的气象更为宏大，期盼着故宫学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期盼着新的研究人才脱颖而出，这就是《故宫学刊》的愿望¹！

《发刊词》除了说明创办《故宫学刊》的目的宗旨，特别说明故宫学的提出与研究，《故宫学刊》的创办，与故宫博物院创办之初的故宫学人、学术传统、学术精神、学术使命的承续关系。这一点很重要，这是故宫学的根底所在，这也充分表明故宫学的提出是对历史的高度负责。

郑欣淼先生故宫学的奠基之作，长近4万字的《故宫学述略》，领衔刊登在《故宫学刊》的创刊号上，这不仅是故宫学的良好开局，也是《故宫学刊》的美好预兆。《故宫学刊》走的是以书代刊的路子，有一个好处是可以不受篇幅的限制。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学术期刊形成了一个“潜规则”，要求学术论文控制在5千字左右，长了就不易刊登。大概与期刊页码有限，一篇论文长了会影响其他论文的发表有关。人为的控制字数实在是不符合学术研究实际的，论文质量的高低并不在于字数的多少。《故宫学刊》完全放开了对论文字数的限制，只要有创新，有探索，不拘长短，尤其欢迎有分量的长文，3万5万字的长文，甚至8万9万字的宏论，都出现在《故宫学刊》上。从2004年的第1辑，到2013年的第10辑，共刊发故宫学研究论文236篇，总计约800多万字，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量。《故宫学刊》的十年，可谓收获丰盛。郑欣淼先生在10辑《故宫学刊》共发表论文6篇之多。丰盛的收获，全赖他开辟的这块阵地，也和他的带头辛勤耕耘分不开。

院长郑欣淼先生虽然是当过和当着省长、部长级的官员，但在我眼里，是一位十足的爱书人、读书人、著书立说的人。记得就在我忙不迭地折腾那几种杂志的时候，院长时不时地同我讨论故宫出版的许多事务，因为我还兼着紫禁城出版社的社长。他不只一次地表达过这样的意思：故宫的资源太丰富了，过不了多久，我们出的书就会摆这么满满的一架子又一架子——他指着他屋子里排满了书的书架这么念叨着。这是一种怎样的让我深受感动深受鞭策的美妙的文化情怀文化理想啊！

我心甘情愿地把院长布置的任务奉为使命。因为故宫博物院是全世界文化遗产资源最全面、最丰富的博物馆，也是全国几千家博物馆中唯一拥有出版社的博物馆。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故宫博物院编辑出版的期刊图书就是文化机构里出得最多最好的，深受社会各界喜爱。我来院的时候，适逢筹划建院80年大庆，实在是一个太好的时机，以此为契机，便扎扎实实风风火火地大干快上起来。《徐邦达集》、《唐兰集》、《罗

1 见《故宫学刊》2004年总第1辑。

福颐集》、《单士元集》等故宫学术大家的文集,《捐献铭记》及捐献大家马衡、张伯驹、郑振铎、孙瀛洲、周绍良等人的专集,集中出版故宫博物院老专家学者代表性著作的《故宫博物院学术文库》,专为中青年学者筹划的以专题专论为特色的《紫禁书系》,作为明清两代皇宫、宫廷生活及故宫博物院史料掌故钩沉的《故宫文丛》,古陶瓷研究及资料整理系列,明清宫廷史研究丛书,故宫大修实录系列,明清宫廷建筑史料长编,故宫学研究史料与研究丛书,各类展览的论文图录专集,等等,筹划并陆陆续续地出版了。正如院长督促和期望的那样,真的是一架子又一架子了。

四 从研究室到科研处

长期以来,故宫博物院这样一个文化学术重地,没有一个专门负责管理协调全院学术研究的职责部门。2004年8月,故宫学提出不到一年,为了提高故宫博物院科研管理水平,加强科研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管理,正式成立了科研处。

科研处是在研究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研究室虽然也负有为全院科研工作出谋划策的咨询之责,但主要还是为院里的年纪较大的专家学者提供较好的继续开展学术研究的环境,并为他们做好服务工作。新成立的科研处在继续做好这项工作的同时,主要职责明确规定为:协助院领导对院科研工作进行总体规划,根据规划制定实施计划并组织实施和管理,协调各业务部门的科学研究工作,为全院重大科研课题及业务决策提供咨询,组织和协调院科研课题项目的申报、评审、经费使用和日常管理,组织鉴定或评审院内科研成果,向院领导和上级主管部门提出奖励推荐意见,组织开办各类业务研讨、培训、学术讲座、学术报告,接待科研单位、学者来访咨询,开展国内外学术、技术交流,组织和协调大型文物图书、学术成果的编辑出版工作。科研处的成立和赋予科研处的职责,使得全院的科研工作有了一个总的抓手,并落实到一个具体的专职的职能部门,从而使科研工作落到实处有了组织机构和体制制度的保障。

我在科研处讨论研究院里的科研工作时,手拟过一个科研工作推进纲要。大体的内容,一是要像郑欣淼院长那样,做学术的担当,尽学术的职责,继承、弘扬和创新故宫博物院学术传统,创造良好浓厚的学术氛围。二是加深认识科研工作在全院工作中的基础性、前沿性、导向性、形象性的作用和地位,理顺并协调解决科研工作与全院工作、日常业务工作的关系。三是建立健全科研工作组织机构,制定充实科研工作规章制度,加强管理,对内激励,对外开放,促进院内外、海内外学术交流。四是实施“四个一”学术工程:1.高举起一面学术旗帜,即故宫学学术旗帜,号召、凝聚、整合、引领科研工作,沿着故宫学学科建设、体系建设的学术轨道行进;2.构建起一个学术平台,即以故宫三刊(《故宫博物院院刊》、《紫禁城》、《故宫学刊》)、《明清论丛》和紫禁城出版社为载体的囊括不同层面的发布、传播、交流故宫学学术成果的平台;3.实施一个项目课题制度,即通过科研课题项目,规划、组织、实施、督查全院、部门、个人的不同时间段的科研项目的落实与完成;4.实现一个科研学术人才培养目标,在10年之内,在更长的时间内,形成不同专业领域的配置合理、承传有序的科研人才梯队,出现并保持30名到50名不同专业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其中一部分达到国内外同专业领先水平。总的方向与目标是搭建起以故宫学为核心的学术网络结构,做到以故宫学为中心的学理、观

念、氛围全覆盖，科研工作体制、机制、制度全覆盖，学术成果发布、交流和学术推进路线全覆盖。

科研处成立之后，故宫博物院的科研管理工作有了明显的改观，亮点至少有三。

一是从2005年院庆80周年开始，在故宫博物院內定期举办故宫学术讲座。我在故宫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的《故宫学术讲坛》第一辑的《前言》中，对举办学术讲座作了介绍性的评述——

2005年，故宫博物院纪念建院80周年的那一年，“故宫学术讲座”正式开讲。“讲座”自然很受大家的欢迎，但又觉间隔时间过长，不够解渴，于是，第二年又办起了“故宫学术沙龙”。“讲座”每季度一次，以延请院外学者为主，讲题相对宏大一些，在可容纳数百人的报告厅举行；“沙龙”每月一次，以组织院內学者为主，讲题相对更专更细一些，在可容纳数十人的会议室举行，便于讲者与听者的讨论交流。2010年9月，故宫博物院建院85周年前夕，出版了《故宫学术讲谈录》第一辑，是2006年至2008年“故宫学术沙龙”的讲谈结集；现在出版的这本《故宫学术讲坛》，则是2005年至2010年“故宫学术讲座”的演讲结集。

演讲者学有专攻，听讲者自是各觉启迪甚多，此中良苦，难以备述；好在有此两种讲谈结集在，常可重温。我想说的是，比起开讲座、办沙龙这件事本身，每一次讲座的谁来讲、讲什么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持续不断的学术讲座对于故宫博物院学术振兴的意义和作用。

像故宫博物院这样的包罗万象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汇聚之地，举世瞩目的世界文化遗产地，百科全书式的公益性文化机构，如果没有厚重的学术积累，没有广泛开放的学术交流，没有学术研究理念与方法的不断探索；如果组织不起盛大的学术团队，培养不出方方面面的专家学者；如果缺乏由多方面构成的稳固的学术支撑，所谓为历史守护、为现世承传、为未来延续、为公众服务、为文化交流作出无可替代的应有贡献，都是不可想象的，就是连与无比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相适应的必须的基础研究的开展也是不可想象的。对举办学术讲座的高度重视，正是基于这样的学术自觉；而学术讲座的开展，理所当然地成为故宫博物院学术建设、学术振兴、学术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年来，社会上似乎出现了“讲座”热，大众传媒，高等院校，研究机构，文化团体，举办者多，演讲者多，听讲者更多，看起来好像有点凑热闹的意思；但绝对不可以把文化学术讲座说成是凑热闹，要说是的话，这样的热闹应该凑，值得凑，应该大凑特凑。当然，仅靠学术讲座远不能抵达学术的目标，完成学术建设的任务，但对于推进学术研究的作用还是不可低估的。故宫博物院的学术讲座自开设以来，颇受欢迎并得以逐步推广。先是全院范围的组织举办，接着，以部门、以研究机构为单位也组织举办起来；先是以外来的学者讲为多，逐渐自家人相互讲的也多了起来。时间长了，就变成一种常态，成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了。习惯成自然，就会逐渐走进一种很美妙的文化的学术的境界。已经有了六七年历史的学术讲座的实践证明，坚持开展多样化的开放式的学术讲座，如期望的那样，确实有助于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树立坚韧的学术精神，磨炼严谨的治学态度，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建设过硬的学术队伍，催生较高水平的学术成果，提升文化服务、文化传播的质量。这样的讲座继续办下去，与时俱进，持之以恒，其作用，其意义，定然是无可估量的。

郑欣淼院长认为这样的学术讲座,是为故宫博物院的研究人员打造的一个开阔学术视野,营造自由探究的学术气氛,鼓励学术争鸣,活跃学术思想,促进交流与创新的高品质的学术交流平台。在这个学术平台上,优良的学术传统与创新的学术思维在相互启发中激荡着,迸发出智慧的火花,给故宫博物院学术研究增添了盎然生机。他还希望“故宫学术沙龙所带来的清新学术气息不应只散发在故宫的高墙大院之内,而应该走出去,给更多关注故宫博物院发展、关注故宫学术进步的人以亲身体验的机会,让更多的同仁参与到认识故宫价值、挖掘故宫内涵和推进故宫学术研究的行列中,共同谱写故宫学术研究的美好未来。”¹ 故宫学术讲座、学术沙龙还在继续,如郑院长希望的那样,故宫学术讲座也已经以多种多样的形式走出了故宫的高墙大院,走向社会,进入学校,进入社区,引起众多听讲者的浓厚兴趣。故宫学术讲座不只一次地走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据记载于《故宫博物院科研工作简报》的学术讲座统计,2008年至2012年,故宫博物院内各部门举办的学术讲座总计113次,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学者在社会上开讲84次。以院内讲座算,加上科研处组织的每月一次的全院性的学术沙龙,每季度一次的学术讲座,平均每月就有3个以上的学术讲座在紫禁城里举办。由部门到全院,由院内到院外,故宫学术因此而蔚然成风。

提到了《故宫博物院科研工作简报》,顺便再说简报的事。为了进一步促进故宫博物院科研工作的发展,及时反映最新的科研信息,交流最新的科研动态和学术成果,更好地为科研业务人员服务,从2008年开始,科研处创办了每季度一期的《故宫博物院科研工作简报》,也算是一种定期刊物了,不过只是一种院内交流的刊物,不对外公开发行。刚开始还是薄薄的一本,很快就越来越厚了。科研工作简报信息量的激增,内容的一期比一期丰富,直接说明着科研工作的进展幅度。像学术讲座、学术沙龙一样,同事同行间学术科研动态状态的及时交流,既使学术氛围更加浓厚,更是对全院从业人员投身科研工作、参与学术研究的无声的动员、激励与竞争。2009年初,召开了故宫博物院首届科研信息工作会议。谈到简报时,大家一致肯定简报的创办是科研信息交流与沟通的创新,是科研管理工作的创新。我同大家一起讨论如何进一步把简报办的“简报不简”,如何有深度地报道科研管理和学术研究两方面的消息。我提出要注意把握每条信息的关键词与亮点,关注研究的过程。对于研究人员来说,过程往往比结果更有用,需要简报的信息员和编辑介入研究过程和研究环节中,善于抓住思路与方法层面的创新,发掘科研过程与细节的价值。并提出有可能的话,简报内容的范围可扩展到院外、国外的同行和相关领域。2012年,科研工作简报编发到17期后,作了较大的改版扩版,在故宫博物院科研信息的基础上,新增了故宫博物院以外的国内外文博科研要情,邀请院内及部分院外外语、专业专长的同仁分语种(日、韩、俄、法、英语)、国家、地区搜集和编译包括文物、考古、历史、博物馆等相关领域的学术信息,内容量因此而翻了一番,并改名为《文博科研要情》,这样,就为故宫博物院的专业人员打开了眺望世界学术动态的窗口,将故宫学人的学术视野进一步扩展到全世界的视域之中,对于故宫博物院这样一座举世瞩目的博物馆来说,自然是非常必要的,急需的。

科研处成立之后故宫博物院科研管理工作的亮点之二,是经过几年的持续努力,基本上完成了为保障和推进科学研究的建章立制的工作,使全院的科研工作、学术研究管理进入了有序、规范、顺畅的轨道。2007年,

¹ 见《故宫学术讲谈录》第一辑《序》,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

召开了故宫博物院建院以来首次科研管理工作会议，郑欣森院长做了故宫博物院科研工作报告。这个报告是建院以来故宫博物院的院长第一次对故宫博物院学术研究的历史、现状、成果、独特性及科研管理工作进行的一次系统的总结梳理，同时明确提出科研管理工作的方向。到2008年，完成了《故宫博物院科研课题管理办法》、《科研成果奖励办法》、《学术著作出版项目管理办法》、《学术档案管理办法》、《故宫博物院与科研院所联合招收硕、博士生的报名条件及管理办法》等8个科研管理规章制度的制定，编制了《故宫博物院近期科研规划（2008～2010年）》、《故宫博物院中长期科研规划纲要（2011～2020年）》。科研规章制度的全面建立和近期、中长期科研规划的编制，对于建立科学的学术秩序、树立学术规范、理顺学术方向起到了重要作用。科研学术发展的实际状况也一再证明，建立稳定稳固的科研制度，以制度规范学术、以制度管理学术、以制度引导学术的思路和做法，是振兴学术、推动科研工作持续发展的基本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制度保障。

亮点之三是建立和逐步完善了科研课题项目管理办法。科研课题由个人或个人牵头的小组、集体申报，经院学术委员会讨论评审，无记名投票确定可否立项。立项后则与科研经费挂钩。从科研管理的角度看，研究课题的选定、申报、评审和立项本身就是推动研究的过程。在逐步形成的从学术研究理念，到科研管理体制机制，再到学术出版保障方面的比较完备的整体科研格局中，科研课题项目管理是核心环节。在某种意义上说，课题就是研究，课题就是成果。而课题管理的核心是通过管理提高课题质量。为了有效提高选题质量，从2007年开始，科研处发布年度科研课题指南。就以2007年为例，这一年，科研处广泛征求了各方意见，制定、发布了《故宫博物院2007年度科研课题指南》和《故宫博物院2007年度拟申报集体攻关科研项目的说明》。《指南》明确提出2007年度科研课题项目的指导思想、总体布局、重点安排，为申报者的申报，也为全体业务研究人员了解院近期科研重点提供了参考依据。《说明》指明2007年院科研工作继续加强基础建设，重视故宫基础资料、史料的搜集整理；重视基础研究的同时，加强宏观研究，加强理工文的交叉与渗透。在申报和评审过程中，大家普遍反映，在《指南》和《说明》的引导下，2007年科研项目选题与批准立项的22个科研项目的整体水平比以往有了明显的提升。以故宫学为核心的课题项目管理，对统筹、组织、拉动全院的学术研究，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科研课题项目的科学管理，经费配套，以故宫三刊为主的成果发布平台的搭建和出版资助，同时也对故宫业务人员研究人员起着很大的激励作用。为了加大激励力度，健全激励机制，2009年，故宫博物院开展了规模盛大的1991～2008年科研成果评奖工作，通过褒奖近20年来在科研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专家，进一步激发全院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营造更加浓厚的科研氛围，从而有力推动以故宫学为核心的学术研究工作。历经半年的时间，从近20年的科研成果中评出60个获奖项目，年底举行了隆重的颁奖大会。郑欣森院长在颁奖大会报告中说了这么一段话：

这是故宫博物院建院以来第一次召开科研成果颁奖大会，这表明了这一届院领导班子对提高我院整体学术水平的决心，也反映了我院专家学者们和广大业务人员的良好愿望，意义重大。这次评奖是对我院自1991年以来科研、学术成果的检阅和总结，获奖的科研成果代表了本院18年的学术、展览和出版的水平。其中涌现出一批中青年学者的优秀成果，表现出宽阔的学术视野和交叉学科

研究方法，使人印象深刻，且展现了我院学术的“后劲”。此外，评奖工作也使我院科研管理水平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和完善。2004年成立科研处以来，我院制定并不断完善了一系列科研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采取了人才培养的学位制度，编制了近期和中长期的科研规划，开展了多种多样的学术交流活动。这些都为我院各项学术研究和发​​展提供了多方面的保障。科研成果评奖工作就是为营造出人才的成长环境、激励人才的发展、确立人才的典范的很重要的激励措施之一。

在颁奖大会上，院外评委代表，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赫治清研究员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尚刚教授对获奖成果作了综述、评点，从明清宫廷史和书画、古器物研究的层面详细评述了我院研究成果中所体现出的“故宫特色”与整体水平，并结合学科的发展为我院研究人员提出宝贵的方法论建议。获奖代表、最佳学术著作奖获得者罗文华在获奖感言中现身说法，与大家分享了他的学术“三项基本原则”：“我的研究始终不脱离故宫”；“我的研究不能局限于故宫”；“故宫学不只是故宫人的学术，它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他说：“只有每位研究人员的学术进步，才能有故宫学术的进步；故宫学术能走得多远，要看我们的思想能走多远，看我们的心胸有多宽广。”获奖代表、最佳学术著作奖获得者苗建民谈了他在学术研究中的切身感受：“在故宫学这面旗帜的指引下，促进科研工作不断发展的运行机制正在形成，我院的各项事业呈现出了蓬勃发展的的大好局面。究其原因，我觉得故宫学的理论指导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一项事业有了科学的理论作为基础，各项工作就有了合理的归属，就有了前进的动力和持续发展的保障。对此我有着切身的体会。借此机会，我感谢院领导班子为全院良好学术氛围的形成所作的创新性理论探索 and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不断实践。我愿意和全院同仁一起，在故宫学的理论实践中，为故宫博物院各项事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¹

与2009年的这次科研成果评奖衔接，从2009年开始，按照故宫博物院2008年颁布的《科研成果奖励办法》的规定，三年一次的科研成果评奖于2012年如期进行。科研处制定并发布了《故宫博物院2009～2011年科研与出版成果评奖细则》。按照规定程序，从2009年至2011年的科研成果中评选出53个获奖项目。2009年和2012年连续两次大张旗鼓的科研成果评奖活动，既是故宫博物院学术成就的阶段性的总结，更是故宫博物院通过建立和完善学术科研激励机制，营造创新学术风气，催生创新学术研究成果大见成效的见证和公示，也是故宫博物院科研制度、激励机制从此进入常规常态，科研保障体制基本形成的鲜明标志。

如获奖代表的感言所表达的那样，亦如我在不同范围召开的不同主题的学术座谈会上听到的那样，许多专业研究人员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觉得在故宫博物院逐渐形成的这样的学术氛围、学术环境里，从事学术研究的幸福指数比较高。从管理者的角度来说，这的确是我们尽力追求的目标。我觉得故宫博物院的研究人员如果没有这样的感受的话，肯定就是我们科研管理工作的失误。我曾经同研究人员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在故宫博物院确实具有做学术研究的优势：博物馆的公益性决定从事学术研究有高尚感，因为我们的研究是在深入研究的层面继承和传播我们的民族文化，而且受关注度高，受众面广，研究的价值会被放大，同样的研究会产生更大的影响；故宫博物院无比丰富的学术资源优势决定我们的研究有优越感；比较容易出成果、

1 以上三位的引文见《故宫博物院科研工作简报》2009年第4期。

发表成果决定我们的研究有成就感。

当然也有相应的紧迫感，因为故宫博物院不会亏待、抹杀任何一位研究者的成果，不怕科研成果发表不了，出版不了，就怕拿不出成果。在这样良好的学术环境里，故宫学人自当以继承传统、超越功利、激发兴趣、投入情感、贵在创新的学术品格，不断创造出出色的研究成果，做到不辜负、不浪费可贵的研究资源与难得的研究条件。

五 从 5 个研究中心到故宫学研究所到故宫研究院

2005 年 10 月，故宫学提出满两年之际，适逢故宫博物院建院 80 周年。由于故宫学的提出及已经引起较大的反响，80 年大庆的主题与故宫学呼应，定位于学术性、国际性、开放性。核心内容由中、英、德、日、美世界五大博物馆馆长对话紫禁城和四个国际学术研讨会组成。

五大博物馆馆长分别来自英国大英博物馆、德国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史密森研究院和中国北京故宫博物院。四个国际学术研讨会：一是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联合召开“故宫博物院 80 华诞暨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二是与中国紫禁城学会共同邀请中外学者召开“中国明清宫廷建筑国际学术研讨会”；三是故宫博物院古书画研究中心成立暨《清明上河图》与宋代风俗画国际研讨会；四是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成立暨古陶瓷国际学术研讨会。

世界五大馆长在紫禁城对话，四个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故宫博物院召开的前后，前有以“文明对话”为主题的紫禁城国际摄影大展为 80 年大庆预热，后有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拍摄的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故宫》12 集精华版在央视一台热播。

故宫博物院在庆祝建院 80 年的时候，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至少在文化艺术层面，在学术层面，突然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故宫热、故宫学热，此种现象，实为筹划院庆活动之时始料未及。

对故宫学建设产生长久影响的是院庆期间成立的两个研究中心和一个实验室——故宫博物院古书画研究中心、古陶瓷研究中心及古陶瓷检测研究实验室。

以古陶瓷研究中心的成立为例。古陶瓷研究中心是故宫博物院老中青几代古陶瓷研究者同心协力精心筹划充分准备建立起来的。2005 年 10 月 10 日上午，中心揭幕挂牌，当采集自百余处古陶瓷窑址的瓷片，等待粘对的陶瓷实物资料，成系列的清代御窑瓷器，产自美国、法国、德国、荷兰、日本及中国的仪器分析设备，琳琅满目地出现在标本陈列室、观摩室、实验室之时，让所有中外见证者眼前一亮，惊叹不已。

仍由我兼任主编的《紫禁城》特别编辑推出一期“古陶瓷研究中心成立特刊”。¹我在“特刊”前一期的《紫禁城》封底预告中很是兴奋地写了如下的广告词：

144 个窑址，3 万余古陶瓷片，18 件古陶瓷孤品，20 位客座研究员；最大范围的中国古窑址实地调查，最丰富的中国古陶瓷瓷片标本，最能填补空白的古陶瓷实物资料，最成系列的清代御窑

1 《紫禁城》2005 年第 5 期。

瓷器，最高端的科技钻研最古老的瓷器，最权威的陶瓷专家评估，最具价值的陶瓷文化资源。

虽为广告，实无半点夸饰。

《紫禁城》“古陶瓷研究中心成立特刊”打头的是郑欣淼院长撰写的《古陶瓷研究中心记》：

故宫博物院，中国最大的古代艺术品宝库，百万珍藏，瓷器 35 万之重，多出自宋代“五大名窑”，明清两代景德镇御窑厂，是故宫博物院藏瓷的基础和精华。

自 20 世纪 50 年代始，故宫博物院陶瓷组工作人员就对分布全国的 140 多个窑口进行调查，采集了 3 万余瓷片标本。加上原宫廷生活中淘汰的各类瓷器碎片标本上万片，这无疑为陶瓷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材料。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古陶瓷，全面地反映了中国陶瓷生产 8000 年连绵不断的历史，为世界其他博物馆或美术馆的陶瓷器收藏所无法比肩。

故宫博物院凭借其得天独厚的条件，曾造就出一大批享誉海内外的文物研究专家。在古陶瓷研究领域，陈万里、孙瀛洲、冯先铭、耿宝昌先生等闻名遐迩，使故宫博物院在这一领域长期独领风骚。

丰厚的藏品基础和研究优势，使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的成立成为必然。

古陶瓷研究中心，是故宫博物院国际性学术研究机构之一，它将利用故宫博物院在人才和收藏古陶瓷文物、资料、标本以及引进各种先进检测仪器设备等方面的优势，为国内外专家、学者搭建一个开展综合性合作研究的学术平台，旨在使故宫博物院陶瓷藏品的诸多内涵为世人所知，以弘扬博大精深的中国陶瓷文化。

接着是郑欣淼院长在《古陶瓷研究中心记》中提到的耿宝昌老先生为古陶瓷研究中心成立撰写的《心愿》：

中国的陶瓷历史源远流长，留传至今的文物浩如烟海。北京故宫博物院，35 万件古陶瓷已进入科学化的管理范畴，研究硕果累累；近 8 万件陶瓷实物资料，却因长期无暇顾及，谈不上对它们的科学保管与研究。

半个世纪以来，这批资料一直散存于院内八九处库房，绝大多数器物从未发表。虽然对它们有所熟悉，但由于其长期被尘土遮盖，疏于管理，一旦想找记忆中之某件，若大海捞针一般。

为庆祝故宫博物院建院 80 周年，院领导决定建立“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下设“故宫博物院古陶瓷资料观摩室”，将故宫博物院现有的丰富资料公之于众，为国内外博物馆界及陶瓷学者开展学术研究，提供一良好平台。

久未翻动的这批陶瓷实物资料，由此被从各个库房全部集中存放一处，经点核、清洗、分类、修复等工作，从中挑选出 543 件典型器在观摩室展出，并结集出版。

这批资料的征集工作肇始于上个世纪 50 年代，源于多方。故宫博物院已作古的陈万里先生、

孙瀛洲先生、冯先铭先生生前对陶瓷资料的搜集工作曾倾注心血，且陈老捐出亲身考察的越窑青瓷标本，孙老也捐出陶瓷资料完整器 500 多件，可谓功不可没。

这批资料经过整理，并被充分利用，实现了故宫几代陶瓷工作者的共同心愿。

院长、专家之论，足见古陶瓷研究中心成立之价值与意义。除学术研究之意义，还有一层同样重要的意义——研究中心的体制机制对于故宫学研究的创新意义。

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的组成成分两部分，一部分聘自院内，聘为研究员；另一部分聘自院以外的世界各地，聘为客座研究员。这样，就尽可能地将院内外、国内外这个领域里顶级的专家学者集中到研究中心了。如古陶瓷研究中心聘请的 20 位客座研究员中，7 位分别来自法国、德国、美国、日本、土耳其、新加坡、韩国，3 位来自台湾，2 位来自香港，其余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上海博物馆、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正是由于具备了丰富珍贵的古陶瓷、顶级的专家学者、先进的检测仪器设备这样的综合优势，古陶瓷保护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得以落户故宫博物院。

继古书画研究中心、古陶瓷研究中心成立之后，以同样的模式，于 2007 年、2009 年，相继成立了故宫博物院古建筑保护研究中心、藏传佛教文物研究中心、明清宫廷史研究中心。5 个研究中心充分利用资源整合优势，不断探索开放的研究路径，扩大研究领域，开创合作方式，学术研究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以藏传佛教文物研究中心为例。该中心成立之前，研究人员就向着成立研究中心的目标创造着充足的条件。在成立仪式上，就分别与法国高等实验研究学院、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等 7 家国内外学术研究机构签署了学术合作框架协议。从这一年开始，藏传佛教文物研究中心与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汉藏佛教美术研究所联合承办由故宫博物院、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联合主办的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该讨论会每三年举行一届，每届会议都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大力响应、积极参与，已经成为藏学界和艺术史界的国际例会。故宫博物院专为藏传佛教文物研究中心在明清两代藏传佛教活动场所设立了院藏藏传佛教文物陈列厅。经典的展品，丰富的藏传文物藏品，众多的宫廷藏传佛教活动场所，与新成立的研究中心一起，整合形成无可替代的真正的藏传佛教文物研究中心，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到目前为止，在故宫博物院的机构设置中，5 个研究中心还是非建制单位，除个别专职人员外，大部分研究人员虽然为院内兼职与院外兼职，但各自的专业与各个中心研究方向高度一致，在研究中心有明确规划和操作程序的协调下，近几年的运行证明，这样灵活的组合反倒更有利于在不脱离专业工作的同时发挥各自的研究专长。强强联合的综合优势的发挥，尤其表现在各个研究中心研究项目的筹划和组织召开的学术研讨会学术质量的大幅度提升上。

2010 年，在故宫博物院建院 85 周年之际，故宫博物院专为故宫学研究而建立的一个实体性建制单位诞生了，这就是故宫学研究所。如果说 5 个研究中心做到了虚而不虚的话，那么，故宫学研究所的建立和短短两年多的运行，则是实而又实的了。

就如最先成立的两个研究中心是在故宫博物院 80 年大庆时揭牌的一样，故宫学研究所是在故宫博物院

为纪念建院 85 周年暨紫禁城建成 590 周年而隆重召开的故宫学研讨大会上宣布成立的。

故宫博物院建院 85 周年故宫学研讨会由一个大会和三个分会组成。

三个分会，一是由古陶瓷研究中心和古陶瓷保护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组织召开的宋代官窑及官窑制度国际学术研讨会。此次学术研讨取得的重要而丰硕的收获，是对 5 年前古陶瓷研究中心成立时设定的目标的成果回应。也就是说，成立研究中心，充分发挥故宫博物院藏品和人才优势，开辟自然科学研究新领域，借助外界专家学者的力量，通过开展课题项目研究，把传统研究方法与科学技术手段相结合，有效发现和解决中国古陶瓷研究领域的重大学术问题——以这样的理念与方法取得的突破性成果，使古陶瓷研究界备受鼓舞。

二是由明清宫廷史研究中心组织召开的明代宫廷史研究丛书新书发布会暨明官史研讨会。这是一次以成果展示与评价推动明代宫廷史研究，填补和改变故宫学研究领域薄弱环节的很有实效的学术研讨会。

三是古建筑研究中心和中国紫禁城学会组织召开的故宫博物院 85 周年院庆暨中国紫禁城学会第 7 次学术探讨会，研讨会的主题是皇家建筑文物价值的完整保护，比较集中突出地讨论了故宫学、皇家建筑、明清宫廷建筑三个概念及其关联。

在三个分会集中在一起召开的故宫学研讨大会上，郑欣淼院长作了《故宫学 7 年：构建、发展和展望》的主旨演讲，翔实地论证了故宫学的价值与意义、故宫学研究对象和范围、故宫学学科特点等。特别指出海峡两岸两个故宫博物院同根同源，故宫学则是连接“一个故宫”和“两个博物院”的纽带。

就是在这样的大会上，故宫学研究所正式成立。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和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致辞并为故宫学研究所揭牌。王文章在致辞中说，故宫学的倡导，故宫学研究所的建立，是当代中国保护优秀文化遗产的必然要求，标志着故宫博物院的发展走向了新阶段。故宫学研究的科学成果将促进人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尊重，激发创新精神，同时也将引领和提升故宫博物院自身价值的发挥。宋新潮在致辞中说，故宫学的提出是故宫博物院学术研究的新起点，也是对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及其相关工作的理论探索¹。

在故宫学提出 7 年之后，在 5 个研究中心建立并显示出旺盛的学术生命力的时候，在故宫博物院 85 周年纪念的大背景下，故宫学研究所的建立，在故宫学建设的历史上，尤其是在故宫学建设的组织体制保障上，具有历史性意义。

我受郑欣淼院长委托，代表故宫博物院向大会作了“我们为什么要建立故宫学研究所”的说明：

在故宫博物院建院 85 周年之际，我院决定正式成立故宫学研究所，并在今天的故宫学研讨会上举行揭牌仪式。我受院领导的委托，向各位简要报告我们为什么要成立故宫学研究所。

正如郑欣淼院长所阐述，故宫博大丰富的内涵需要故宫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需要故宫学；也如郑欣淼院长所阐述，故宫学的构建、发展需要建立故宫学研究所。

一个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一个现实实践要求的、一个未来发展必需的故宫学学说学科的建设，既需要旗帜鲜明的理论理念的提出，也需要浓厚的认同认知的学术氛围的形成，还需要必要的体制

¹ 以上内容详见《故宫博物院科研工作简报》2009 年第 4 期，2010 年第 3 期。

机制的保障。故宫学的提出是理论的创新，从研究室到科研处的设置，再到5个研究中心的建立，再到故宫学研究所的成立，是故宫博物院科研体制机制的不断创新。

故宫学研究所以故宫学学科建设、故宫学学科体系构建为己任；故宫学研究所以吸引、培养、聚集故宫博物院的以及全社会的故宫学人才为己任；故宫学研究所以策划、实施、完成重大故宫学建设工程、故宫学研究项目为己任；故宫学研究所以整合故宫学术资源、开展国内外学术合作交流为己任；故宫学研究所以不断推出故宫学研究成果为己任；故宫学研究所以形成自己鲜明的不可替代的学科特色和做出独特的学术贡献为己任。

故宫博物院成立前后，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国营造学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先后成立，当时的高等学府，这一类的高端学术机构的不少学者直接参与了故宫博物院的创建，由此奠定了故宫博物院扎实的学术基础并形成了故宫博物院优良的学术传统。接续学术脉络，光大学术传统，创新学术精神，是故宫学研究所注定要承担的学术使命。

故宫学研究所故官人的努力下，在学界的大力支持下，在热心于故宫学的学者的积极参与下，一定会不断地成长壮大。

故宫学研究所在故宫博物院的建设发展中，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传播中，一定会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对故宫学研究所充满信心，充满期待。

故宫学——《故宫学刊》——故宫学研究所：三位一体的科学合理的优化组合，构建起故宫学建设发展的稳固格局。从理念到研究成果发布平台到专职机构，故宫学不紧不慢地、一步一步地、扎扎实实地落地生根了。

从故宫学研究所调配人员正式运作算起，到2013年，满打满算，也就两年的时间，但在这两年的时间里，故宫学研究所居然筹划组织召开了11个学术研讨会：

- 辛亥革命与故宫博物院建院学术研讨会（2011年9月）；
- 故宫学的范畴、体系与方法学术研讨会（2011年11月）；
- 第二届明代宫廷史国际学术研讨会（2011年12月）；
- 明代宫廷生活史学术研讨会（2012年8月）；
- 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史学术研讨会（2012年11月）；
- 宫廷与江南学术研讨会（2012年11月，与苏州大学合办）；
- 明清宫廷史对比学术研讨会（2013年4月）；
- 清代宫廷戏曲学术研讨会（2013年5月）；
- 宫廷典籍与东亚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2013年7月）；
- 故宫学与明清政治文化（2013年7月，与东北师范大学合办）；

故宫学十年纪念学术研讨会（2013年10月）。

这些研讨会，我大部分参加了。研讨会大多规模不大，但参会者须以提交论文为必要条件。据我所见，论文质量较高，目标是会后修改完善达到出版论文集的水准。另一特点是参会学者一般院外多于院内，院外学者又以高等院校教师为多。除了组织多达11个的学术研讨会，2012年、2013年，故宫学研究所连续两年组织举办了两届故宫学高校教师暑期讲习班，另外还筹划组织了故宫学研究和故宫学研究资料两套丛书，进展亦很顺利。

两年来的故宫学研究所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局，而且，其鲜明的将故宫学向高校推进的学术路径，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此举无疑大大推进将故宫学建设成学科的进度，对于故宫学的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就此，我会在后面的部分进一步展开论述。

2013年，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古文献研究所、明清档案研究所成立，故宫博物院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建成，与已有的研究室、故宫学研究所和古书画研究中心、古陶瓷研究中心、古建筑研究中心、明清宫廷史研究中心、藏传佛教文物研究中心一起，这些分门别类的覆盖了故宫基本专业面的研究团队，共同组成了与故宫资源优势相匹配的故宫研究集团军——2013年10月，在故宫学提出满10年之际，酝酿多年的故宫研究院正式揭牌。

故宫研究院的成立，是故宫学研究团队成长、壮大、成熟的历史性标志。

六 从清史编纂委员会到明史学会到马普研究所到台北故宫博物院

坚持故宫学的开放性、世界性，主要表现在以远大的学术眼光，以开阔的学术胸怀，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努力推进故宫学研究与院外与国外的专家学者、研究机构的密切合作。

故宫博物院拥有的故宫学优质学术资源，与明史、清史研究最为密切。20世纪、21世纪之交，故宫博物院就开始与北京大学合办年刊《明清论丛》，已出版到第12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于2003年，负责备受社会和学界关注的清史编纂工程的实施。众所周知的原因，故宫博物院与清史编纂密不可分。这些年来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合作既是实质性的，又具象征意义。2005年故宫博物院80年大庆，影响最大的庆祝活动就是与清史编纂委员会共同举办故宫博物院80华诞及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大会开幕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文化部部长、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组长孙家正致辞，郑欣淼院长、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教授等发表学术讲演。来自中国内地及港澳台地区历史学界、考古学界、文博学界的专家学者，与来自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加拿大、哈萨克斯坦、澳大利亚等国的清史学者共计160余位，就清朝历史所包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以及文献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讨。故宫学与清史编纂、故宫在清史编纂中的地位成为本次研讨会的一大热点。在此后的2007年、2009年、2011年，故宫博物院与清史编纂委员会连续共同举办了第12届、第13届、第14届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

在第13届国际清史研讨会的开幕式上，郑欣淼院长回顾了故宫博物院与清史学界合作深度和广度不断

加强的历程，他说故宫博物院感触最深的是拥有了更加开放的学术研究视野。故宫人走出高墙，将研究视野拓展到与工作相关联的历史、文博、考古、艺术、古建等多个学术领域，积极与相关学会、各省市考古文博机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开展多方面的学术合作。国家清史编纂工作启动以来，故宫人更积极参与其中，陆续整理公布相关学术资料，进一步发掘有故宫特色的清史内涵，对清史编纂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故宫博物院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清史编纂事业，与清史学界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担负起传承民族文化的共同使命。¹

2011年，纪念中国辛亥革命百年，以辛亥革命史研究和清史专题研究为主题的第14届研讨会，在故宫博物院与清史编纂委员会合办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为协办单位。每次国际清史研讨会，都有近百篇论文提交，参与学者之广，涉及问题之多，讨论之深入，成果之丰富，均为前所未有的。

与明史研究界的合作，则以明代宫廷史研究这一重大研究项目为纽带。明清两代皇宫紫禁城虽然是明代肇建，但与清史、清代宫廷史研究相比，可能是时间远近与资源多少的原因，明史、特别是明代宫廷史研究一直是故宫博物院的薄弱环节，史学界亦如此。对于故宫学来说，明史、特别是明代宫廷史的研究或许更为重要，至少不应比清史、清宫廷史薄弱。故在故宫学研究的规划部署中，在配备研究力量和安排研究课题、研究项目时，格外重视弥补明史、明宫廷史研究力量方面的不足。为此，我虽非明史专业，还是策划并出面主持了明代宫廷史研究的重大项目。特别在项目的前期论证立项过程中，不知与中国明史学会的领导、学者讨论过多少次，最终才确定了组织编纂出版一套大型明代宫廷史研究丛书的项目。明史学会倾力支持帮助，明史研究界的专家学者积极参与。这个项目的执行负责人赵中男博士，更是为这个项目的一步步落实，不知找了多少人，跑了多少路，开了多少会。2010年，在故宫博物院建院85周年及紫禁城建成590年之际，召开了这个项目首批成果的4种新书发布会暨首届明官史研讨会。在2011年中国明史学会召开的第14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国明史学会高度评价了故宫博物院在明代宫廷史研究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充分肯定了在故宫学旗帜下率先发动和组织海内外的学者，撰写规模庞大的包含近20种专题专著的明代宫廷史研究丛书，是对明代宫廷史研究开拓性的工作，意义深远。台湾明史学会理事长邱澎生先生认为，明官史研究项目的开展和明官史研究丛书的出版，标志着故宫博物院的学术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已从较单纯的器物研究进入到宫廷史综合研究的新领域了，对台湾的明史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美国明史学会前会长姜永琳先生指出，从国际宫廷史学的发展情况看，中国的宫廷史研究无疑是较为落后的，但故宫博物院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几种明官史研究丛书，并且有几种还是专业性较强的宫廷建筑史、宫廷戏剧史、宫廷陶瓷史等，说明中国的明官史研究起步虽晚但起点很高，这一点不仅反映出故宫博物院领导人在学术事业上的远见卓识，同时也反映出丛书策划和组织者的非凡能力，尤其是确定体例和遴选作者的能力，以及与国际宫廷史学界接轨的可贵决心。²

与国外科研机构的学术合作，当以与马普研究会所属的马普科学史研究所的合作为代表。

1 见《故宫博物院科研工作简报》2009年第3期。

2 见《故宫博物院科研工作简报》2011年第3期。

马普研究学会 (the Max Planck Society) 于 1948 年 2 月 26 日在德国哥廷根成立, 以德国近代伟大的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 (Max Planck, 1858 ~ 1947) 的名字命名。马克斯·普朗克发现的能量量子对物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18 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被学界尊为“量子力学之父”。马普研究学会成立之初即拥有 25 个研究所, 主要致力于国际先进水准的科学研究。1966 年, 其下属研究所数量增至 52 个。目前, 在全球拥有近 80 个研究所, 覆盖了自然科学、生物与医学科学以及人文与社会科学等学科。早在 1974 年, 马普研究学会就与中国科学院建立了合作关系, 迄今已有 30 多年长期、稳定的合作, 合作完成了大量科研项目, 每年均有学者互访。马普研究学会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拥有雄厚的科研资金, 聚集了全世界优秀的科学家参与其科研工作, 而且也着力为有培养潜力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搭建学术平台。

2007 年 11 月, 故宫博物院与马普科学史研究所合作开展“中国古代宫廷与地方技术交流史”研究项目, 采取跨学科合作的形式, 从科技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国文化遗产。该课题的关注点在于, 科技知识是如何被感知、传播与评论, 最终形成不容忽视的“知识文化”, 并如何随着时代流转而发生变化。试图寻找到一种新的角度与方法, 研究中国古代科技知识的进展, 尤其是宫廷与民间知识技术的交流、不同阶层之间的交流、技术传播的路线以及技术创新的动力等问题。这一课题将中国历史上的创新文化置于大的历史背景下, 用全新的目光来审视影响文化、技术创新的各种因素及其作用, 对于我们理解古代中国在体制、文化、社会、经济和技术等要素的相互影响下技术知识文化的传播意义重大, 对今日的创新环境的研究亦有重大意义。双方议定, 最终的研究成果, 以中、英文两种版本分别在中国和德国出版。

2008 年 4 月, 双方据合作协议, 共同举办了“中国古代宫廷与地方技术交流史”研究工作会议。参与该课题研究的故宫博物院的 6 位学者, 向来自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北京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香港中文大学、台北“中央”研究院以及德国、美国和日本的专家学者分别做了主题报告: “皇宫与地方建筑内檐装修技术的交流——以宁寿宫花园建筑为例”(张淑娴)、“西藏与宫廷——乾隆时期藏传佛教铜法器加工技术之选择与引进”(罗文华)、“12 ~ 18 世纪官民瓷业技术的互动”(王光尧)、“宫廷与民间的交融——以清代乾隆时期清宫和苏州的玉石雕刻为考察对象”(郭福祥)、“北京、广州与景德镇——康熙、雍正时期的画珐琅”(许晓东)、“艺术、技术与制度——顺、康时期的上用服饰”(张琼)。各位专家在提前审阅并仔细听取了上述报告之后, 从不同的角度、相关的研究方法以及细节性的问题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实质性且卓有见地的建议, 为课题下一步的深入与拓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008 年 6 月至 8 月, 故宫博物院的课题组成员赴德国马普科学史研究所与德方研究人员进行了为期 3 个月的合作研究。在德国期间, 每周安排一到两次的讨论, 除研究内容外, 讨论主要集中在研究方法层面。2009 年 7 月至 9 月, 课题组成员再次赴德进行第二轮为期 3 个月的学术交流。双方研究者每周安排两个半天的时间, 就故宫博物院 6 位成员的 6 篇论文稿逐一讨论, 充分交换意见后, 由作者补充修改, 到交流活动结束前基本定稿。此次中西合作开展课题研究, 尝试以技术文化史的视角进行清代宫廷技术的研究, 扩展了故宫博物院的研究领域; 合作研究的方式、程序、方法, 开阔了学术视野、学术路径; 合作研究建立起与西方学者交流的平台, 打开了与西方学术界联系的通道, 同时也积累了合作研究的经验。为了让更多的故宫学人分享此次合作的多方面的收获, 2009 年 10 月, 故宫博物院举行了全院研究人员参加的该课题成果报告交流会,

课题组成员分别介绍了合作研究的诸多感受与收获。自始至终组织协调课题研究的科研处负责人宋玲平博士总结出此次合作四个方面的意义：一是体现了故宫博物院学术的开放性与国际性，是故宫学走向世界的具体体现之一，为故宫博物院的学术研究走到世界前沿做出新的探索与成就；二是此项目是关于技术文化史的研究，这对故宫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具有开创与填补空白的意义；三是此次合作使参与者得到了很好的锻炼，能够直接感知、实践新的研究理念、视角与方法，为故宫学人走向国际学术研究大舞台提供了诸多启示；四是合作过程的工作方式为故宫博物院的科研管理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特别是研究过程注重讨论与交流等，对我们都是很好的启发¹。

2010年10月，研究成果的中文版以《宫廷与地方——十七至十八世纪的技术交流》为书名由紫禁城出版社结集出版。我写了如下文字作为序言——

与享有国际盛誉的德国马普研究学会所属的马普科学史研究所合作，无疑是一次令人兴奋和充满期待的学术合作与交流互动。

作为同样享有国际盛誉并足以全面见证中国历史文化的故宫博物院，虽然每年均有多个文物展览在世界各地流动展出，多项学术交流在世界各地进行，但与马普所合作，从科学技术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宫廷文化遗产，还是别开新面的。

至少有如下理由努力促成并扶持这个项目取得预计的成果：

——国际性的深层的卓有成效的学术合作与交流急需加强。一座世界著名的博物馆，藏品的交流展示当然至关重要，配合文物展览的学术交流，富有创意的、能够充分显示文物资源特色的专题学术合作交流，在交流中形成与文物资源相称的学术对话、学术话语权，是更有渗透力、影响力的文化传播。

——跨学科的研究课题的合作交流极为重要。博物馆以藏品取胜，对藏品的深入研究更胜一筹，尤其是对于不但藏品丰富，且与历史遗址形成一个整体的综合博物馆来说，学术研究不应该只停留在对藏品的研究上，也不应该只停留在对物与史的打通上，纵与横的打通上，还需扩展到学科之间的打通上。

——学术视野要放大，学术理念要提升，研究方法要多样。人文学科有人文学科形成的研究视野、理念与方法，理工科技有理工科技形成的研究视野、理念与方法，中国有中国形成的、西方有西方形成的学术研究视野、理念与方法，在合作交流中实现它们之间的、特别是落实到研究项目、研究方法上的互动互补，是开创与进入学术研究新境界的通达之路。

——已经实施的科研管理中的科研项目管理办，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的科研项目管理办，还需要不断吸纳新的因素，需要不断完善创新。马普研究学会拥有的积累了60年之久且效果卓著的科研管理经验，值得认真借鉴。一个合作项目的实施，是一次项目管理的全程全新的实验。

1 见《故宫博物院科研工作简报》2009年第4期。

——在高起点、高水平的合作中，勇于将自己置于面对挑战与检验的学术环境里，才会真正获得超越自我的机会与可能，才会真正获得向世界展示自我与我们的团队水平的机会与可能。

决定与马普所合作之时，在充满期待中也不无担心。毕竟是一次需要实力的高水准的国际学术对话。不过，心里还是有数有底的——自郑欣淼院长首倡故宫学以来，故宫博物院出现了全新的学术面貌，随着新的学术理念的确立，学术氛围的形成，研究机制的建立，研究方法的演进，研究的深入，研究梯队的结构性变化，一批中青年学者迅速成长起来，加以参与者诸位良好的学养背景、科研管理与学术研究自身经验的积累，和我所感知到的我们这个团队的学术敏感与研究能力、研究活力，相信可以克服合作中遇到的任何难题。

这本书——他们的研究成果的结集就是明证。据我所知，以这样的合作方式、这样的合作过程取得这样的研究成果，在故宫博物院，在我国博物馆界，都是很有创新意义的，值得给予特别的关注。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提到郑欣淼院长2003年10月提出故宫学，与他于2002年、2003年之交访问台北故宫博物院有关。那次访问，是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首次访问台北故宫博物院。故宫学提出5年之后，进一步实现了两岸两院院长的互访和两院的全面合作。2009年2月，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率团访问北京故宫博物院，这是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首次率团访问北京故宫博物院；3月，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率团回访台北故宫博物院。经会谈协商，达成两岸故宫博物院合作交流8方面的共识：建立合作机制；实行文物影像使用互惠；建立展览交流机制；两院专业人员研究互访；互赠出版品；信息与教育推广交流；学术研讨交流；文化创意产品交流¹。

这一年的10月，北京故宫博物院37件文物赴台北故宫博物院，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一起，共同举办“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11月，第一届两岸故宫博物院学术研讨会“为君难——雍正其人、其事及其时代”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举行，北京故宫博物院派专家组赴台北故宫博物院参加学术研讨。从此，两岸故宫博物院轮流交替主办两岸故宫博物院学术研讨会成为定制。2010年，第二届两岸故宫博物院学术研讨会“永宣时代及其影响”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台北故宫博物院派专家组参加研讨。这年的6月，为纪念故宫博物院建院85周年，两院共同组团，举行了隆重的“温故知新——重走故宫文物南迁路”的考察活动。2011年，第三届两岸故宫博物院学术研讨会“17、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举行。2013年，第四届两岸故宫博物院学术研讨会“乾隆的文化品位”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举行。

故宫学的纽带，将两岸故宫博物院从藏品、展览、学术研讨、业务交流等方面全方位、深层次地凝结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自故宫学提出以后，在开放性、国际性的学术视野指引下，故宫博物院与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据不完全统计，到2013年，故宫博物院与国外有关方面开展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有：

¹ 见《故宫博物院年鉴2009》，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

故宫博物院与英国大英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德国德累斯顿艺术博物馆、美国史密森研究院五大博物馆馆长以“当代博物馆的机遇与挑战”举行“紫禁城对话”；

先后与法国卢浮宫博物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英国大英博物馆、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德国德累斯顿艺术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签订了长期战略合作意向书；

与日本凸版印刷公司合作建立“故宫文化资产数字化应用研究所”，完成了多部关于紫禁城的虚拟数字作品；

与美国世界建筑文物保护基金会合作倦勤斋保护项目、宁寿宫花园的修缮和保护项目及合作建立“家具与内檐装修保护培训中心”；

与意大利文化遗产部合作太和殿科技保护项目；

与美国IBM公司合作“超越时空的紫禁城”项目；

与荷兰国家自动音乐博物馆合作钟表等文物修复保护项目；

与德国马普科学史研究所合作“中国古代宫廷与地方技术交流史”研究项目；

与希腊文化部雅典卫城遗迹保护委员会、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联合举办“雅典卫城和北京紫禁城修复与保护工程研讨会”；

与日本冲绳县教育委员会合作“故宫博物院藏琉球文物调查研究”项目；

与英国伦敦大学考古科学实验室进行学术交流；

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华盛顿佛利尔美术博物馆、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进行学术交流；

与美国钟表收藏协会近40位钟表专家关于钟表修复的交流；

与美国特拉华大学历史建筑与设计中心的交流合作；

与日本民族学博物馆关于汉译《究竟瑜伽鬘》的合作；

与法国远东学院的学术交流；

与英国牛津大学考古实验室的学术交流；

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的学术交流。

以上共计23项。

与国内有关方面开展的学术交流合作有：

与北京大学合办《明清论丛》；

与香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合作建福官花园复建项目、中正殿复建项目；

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拍摄大型文化专题纪录片《故宫》、《故宫100》；

与中国博物馆协会长期合作；

与中国紫禁城学会长期合作；

与中国古陶瓷学会长期合作；

- 与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学会长期合作；
- 与中国玉文化研究会长期合作；
- 与中国艺术研究院联合办学，培养硕博士研究生；
- 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合办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
- 与明史学界合作开展“明代宫廷史研究”项目；
- 与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浙江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南开大学签订合作协议；
- 与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联合发掘丽阳镇元明青花瓷窑遗址；
- 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清县博物馆合作发掘浙江省德清县火烧山原始瓷窑址；
- 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考察甘孜、阿坝地区藏传佛教遗迹和康巴地区藏传佛教艺术及大小金川战役遗址；
- 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西藏文化博物馆、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甘肃永登鲁土司衙门博物馆联合考察鲁土司属寺汉藏佛教艺术；
- 与首都师范大学合作研究汉藏佛教艺术；
- 与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联合主办“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
- 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古陶瓷学会合办“瓷之源——原始瓷与德清窑学术研讨会”；
- 与湖北省考古研究所联合发掘青塘山琉璃窑址；
- 与湖北省武当山特区管委会合办“故宫·武当山（明代）紫禁城文化研讨会”；
- 与湖南省文化厅合作召开“传承创新——醴陵釉下五彩瓷学术研讨会”；
- 与苏州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联合召开学术会议；
- 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包括学者互访、学术成果交流、合作举办展览、定期合作举办学术研讨会等在内的全面的常规化的合作；
- 与澳门民政总署、澳门艺术博物馆的长期合作；
- 与澳门大学、澳门博物馆开展学术交流；
- 与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交流合作；
- 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合作；
- 与北京海淀区政府合作创建故宫博物院北院区；
- 与北京东城区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合作举办故宫讲坛、创建故宫学院；
- 与天津大学合作建设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协同创新中心；
- 与中国文化遗产院签署合作框架协议书；
- 与安徽省人民政府签署合作框架协议书。

以上与国内有关机构的合作交流，共计 37 项。

与国外国内博物馆同行、大学、研究院所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不到十年总计 60 项，平均每年有 6 个国

内外的学术合作交流项目在进行之中。¹

从所有合作交流项目来看,无论是合作交流对象,还是合作内容,均有很广大的覆盖面。加上平均每月三个以上的学术讲座,故宫博物院的所有研究人员,所有的业务工作者,以至所有故宫人,虽然天天处于四面高墙围合的紫禁城中,但却可以随时感受到学术文化的八面来风。这样的学术氛围、学术环境、学术条件,会使每一个人自觉不自觉地突破和超越一隅一城、自说自话、自以为天下第一的局限,自由地徜徉于精彩纷呈的学术世界之中,从而在更加开阔的学术视域下,在更丰富的学术参照体系里,更加准确更加自信地选择、定位、确立自我的学术地位与方向,更加有力地发挥自我的学术资源与研究优势。由此可见,故宫学的开放性、国际性及其意义,就绝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实实在在地落到了实处,发挥着实实在在的作用,不管是激烈碰撞,还是潜移默化,交流和合作双赢,提供和获取共存,吸收和传播互生,其当下与长远效益无可限量。

七 从台湾“清华大学”故宫学课程到故宫学研究生到故宫学高校教师暑期讲习班

故宫学提出以后,在大学教学中产生影响的现象,首先出现在台湾“清华大学”。从2009年秋季开始,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谢敏聪教授正式开了一门“故宫学概论”的选修课,并授予选课学生正式学分。听到这一消息,我的直感是稍稍有些惊讶。但一细想,也在情理之中。这一年距郑欣森先生提出故宫学已有6年。北京故宫博物院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正式来往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并走入常规,并成为两岸新闻和两岸公众关注的热点。有学术敏感的学者教授自然会产生一些想法和做法。果然不出所料,“故宫学概论”选修课一经公布,竟有2000名学生以电脑选课来争取此课程的80个选课名额,而未能以电脑选上该课程的学生,又有数百人争取15个加签名额,这在台湾“清华大学”相关类别课程的学习上可谓盛况空前。2010年春季,来自北京清华大学材料系和北京大学经济系的两位交换学生,也在台湾“清华大学”选修到了“故宫学概论”课程。谢敏聪教授的这门选修课,主要讲述故宫学内容的历史之真、文物之美、意涵之善,以此呈现中国历史的源远流长与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课程内容涉及故宫学的定义、范畴与研究方法及理论体系的构建,中国历代故宫与宫廷建筑,故宫博物院院史,图书文献、档案,故宫各类文物,及故宫学的研究成果与对当今学术的卓越贡献等。开列的参考书目以郑欣森先生的故宫学论著为主。

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与故宫博物院签订战略合作意向书,议定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在相关研究领域开展广泛、深入的合作。合作方式包括互邀参与有关故宫学研究领域的教学活动、学科建设、科研项目、人员培训等工作;互相提供包括故宫学研究领域在内的相关学术、技术支撑,为双方相关领域内学术、技术的发展服务。据战略合作意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决定自2010年11月在其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教学中心设“故宫学”方向课程,学制2年,授予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学位和学历。研究生院作为“故宫学”方向课程的教学单位,以故宫博物院首倡故宫学的郑欣森先生为首席专家。从2012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每年招收博物馆学、文物鉴藏、故宫学专业硕士研究生40名,故宫博物院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

1 以上统计主要依据《故宫博物院年鉴》、《故宫博物院科研工作简报》。

参与教学工作，并担任部分学生的指导老师。

2010年，浙江大学开始筹建“故宫学研究中心”。研究中心定位于围绕故宫博物院古器物、古书画、古建筑、典籍与档案、历史与学术史、文物修复与博物馆陈列等研究方向进行学科建设，并以此为切入点，全面推进故宫学学术研究和人才建设，同时以“故宫在中国，故宫学在世界”的治学理念创设世界一流的研究中心。研究中心聘请郑欣淼先生担任“中心”主任。浙江大学将“中心”作为一个科研教学实体，为此成立专项基金会，定期发布和实施全球性招标课题，每年择优资助故宫学研究领域3～5项前沿研究项目。“中心”的教学和科研计划涵盖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分别制定了本科生和硕士生故宫学课程方案，授课教师中拟聘故宫博物院专家学者10余名。通过2～3年的初步建设，启动故宫学博士学位课程计划，成立博士导师组，由两岸故宫博物院和浙江大学的专家组联合组成。¹

在得知浙江大学积极筹建故宫学研究中心的消息时，与听到台湾“清华大学”开设故宫学选修课的消息一样，同样感到惊讶：故宫学研究中心理所当然在故宫博物院，浙江大学怎么也要成立故宫学研究中心呢？经对上述筹建情况的全面了解，经和浙江大学相关领导沟通，我明白了，浙江大学是把参与故宫学研究，作为其在中国文化建设领域中凝练重大突破方向的一个战略选择来认真筹划的。对成立故宫学研究中心，浙江大学既是积极的，又是十分慎重严谨的。校方对“中心”的成立高度重视，并要求各级学历教育严格按照学校规定程序进行。

2011年5月，浙江大学故宫学研究中心在浙江大学举行了成立仪式。郑欣淼先生在成立仪式上的讲话中讲了这么几层意思：

故宫学提出8年了，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关注。从2009年开始，台湾“清华大学”设立了故宫学概论的课程，去年12月，我到台湾“清华大学”，也应邀请了一次，他们反映很好。台北故宫博物院周功鑫院长和冯明珠副院长对故宫学都给予肯定和支持，我们两家也表示要合作研究的。我院也做了很多努力，创办了《故宫学刊》，我们与中国艺术研究院联合办学，培养与故宫研究有关的人才，我们建立了5个研究中心，我们也成立了故宫学研究所。我们开展了故宫知识进高校活动，到首都的高校，包括北大、清华，除了讲故宫学知识以外，也讲故宫文物知识，受到师生的普遍欢迎。我们一直在考虑，虽然故宫学引起了一定反响，但是要深入发展，不是故宫一家之事，学术是天下之公器，得到高校的参与、认可，我们一起努力，特别重要。昨天上午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招收的第一个故宫学的博士生，顺利通过了论文答辩。今天又来浙江大学出席故宫学研究中心的成立仪式，我真的是很高兴，从心底里感谢浙大领导的远见卓识，感谢浙大对故宫学的厚爱。

虽然浙江大学与故宫博物院是两家不同性质的单位，一家是大学，一家是博物馆，一个在杭州，一个在北京，但我们的精神是相通的。故宫能够与有着光荣历史、深厚底蕴、求实精神的浙大合作，我很高兴。浙大邀请我担任故宫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我欣然接受。故宫博物院也有着与高校合作的优良传统，当年的故宫博物院的成立，就是在北京大学一批学者的积极参与下完成的，故宫博物

¹ 见《故宫博物院科研工作简报》2010年第4期。

院最初的一批学术骨干也主要来自北京大学；今天与浙江大学的合作，将为故宫与高校的合作开启一个新的篇章。

浙江大学有着优良整齐的学术素养、鲜明的教育理念、丰厚的教育资源和严谨科学的学科设置，浙大以敏锐的学术眼光，选择了故宫学作为其在中国文化建设领域中的重要研究方向，利用浙大的学术研究、专业教学等领域的巨大优势和经验，积极参与故宫学的建设与发展，这也将对故宫学的学科建设、学术规范、人才培养等多方面起到显著的推动作用。

今天浙大故宫学研究中心的成立，是个很好的开端。故宫与浙大的结合，是两种不同学术背景的交流，将会开辟新的学术视野，走出新的学术路径，取得新的学术成果，培养出新一代故宫学研究中坚力量。我们愿意以故宫学研究中心的成立为开端和契机，做踏实的工作，共同努力，实现双方多样化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今天我们给中心提供了第一批图书资料，今后将会不断地提供，帮助故宫学研究中心建立一个故宫学书库。我们还会为中心的学者、学生，提供到故宫参观学习、利用资料的一切可能的便利。我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挖掘故宫的内涵，揭示故宫的价值，故宫学研究一定会结出丰硕的成果。我期待经过我们几年的努力，“故宫学”能被列入教育部的学科目录。到时候，我们再来为故宫学研究中心喝彩、庆功。

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教授、浙江大学兼职教授方闻在成立仪式的致辞中提出了怎么写文化史和思想史的问题，提出了艺术基地史的概念，认为浙江大学成立故宫学研究中心是非常大的突破，故宫学研究前途无量¹。

2011年11月，《北京工业大学——故宫博物院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暨北京工业大学“故宫学文化节”开幕式在北京工业大学举行。签约之前，双方对合作内容与前景进行了广泛的调研、沟通和交流。北京工业大学是一所以工为主，理、工、经、管、文、法、艺术相结合的国家重点建设的百所大学之一。作为一座以工科为重点院校，北京工业大学与故宫博物院具有明显的也是特殊的互补优势。故宫博物院规模和数量巨大的文化遗产，需要借助北京工业大学这样的以工科为主的大学的力量，全面地快速地提升文物科技保护的水平；北京工业大学需要借助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学者和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繁荣校园文化，提高师生的人文素养，提高学校的办学质量。合作协议就双方共同培养高层次专门技术人才、建立产学研研究生培养基地、开办故宫学名家讲座等方面做出具体安排²。

2012年1月，南开大学做出决定，成立南开大学故宫学与明清宫廷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历史学科在全国具有重要地位，其中明清史尤其是明清皇帝、宫廷研究人才济济，实力雄厚，与故宫学的宫廷史研究关系最为密切。中心成立后，进一步加强故宫学与明清宫廷史研究，招收故宫学与明清宫廷研究方向博士生，探索与故宫博物院在人才培养、合作研究、学科发展、开放展览等方面的多方位合作，力争用三五年时间，把中心建设成科研成果丰硕、在国内外有相当知名度的研究机构。2012年12月，南开大学故宫学与明清宫廷研究中心正式揭牌。南开大学整合明清史、博物馆学、世界史等领域的研究力量，吸纳故宫博物院相关学

1 以上详见《故宫博物院科研工作简报》2011年第2期。

2 见《故宫博物院科研工作简报》2011年第4期。

者，组成研究中心实力强大的研究团队。中心主任由双方学者共同担任¹。

到2013年，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浙江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总计已经招收故宫学专业研究生30名。

以更广阔的学术视野观照故宫学与高校之关系，高校教学、研究中国历史、政治史、思想史、社会文化史、艺术史、美学、宗教学、博物馆学、考古学、文化遗产学，等等，故宫博物院均是绕不开的参照与研究对象。

无论是从博物馆为社会需求服务的博物馆文化理念出发，还是从扩大故宫学的影响力、渗透力和加快故宫学学科建设的思路出发，与更多的大学在更广泛的学术层面建立密切的有效的学术互动，都是非常必要的故宫学建设、故宫学学术发展路径的明智选择。为此，故宫博物院从2012年开始举办故宫学高校教师讲习班。2012年暑假期间，由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负责承办了首届故宫学高校讲习班。首批讲习班成员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等16所高校，基本覆盖了国内大部分知名大学；一半以上具有教授职称，并担任博士生导师、系主任、院长、研究所所长等职务；研究领域涉及考古学、历史学、文学、艺术学、美术学、建筑学、传播学、地理学、宗教学、工学等。

故宫博物院单霁翔院长在开班致辞中说，故宫学发展近年来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果，不仅架构了学术框架，而且成立了实体性研究机构，更可喜的是故宫学已被纳入了大学的相关课程设置和专业学位设置之中，这也必将反哺故宫博物院人才库的建设、提升和快速发展。

历时两周的讲习班以专题授课讨论、参观考察的形式进行，讨论气氛热烈，学者们表示，讲习班使他们以全新的学术视角看到了很多之前没有关注到的“故宫”，从而产生了强烈而新鲜的关于故宫学研究和教学的动力²。2013年暑假期间，第2届故宫学高校教师讲习班如期举办。

大学是学科建设的基地。任何一门学问，只要列入大学教育的课程之中，就成为被学界和公众认可的学科。故宫学提出之后进入大学研究和教学课程的速度，故宫学在高等教育领域的落地生根，对于一门新兴的学问来说，的确是比较快的，甚至是超乎想象的快。特别是一些标志性的大学与国家最高研究机构纷纷与故宫博物院联合开展故宫学教学与研究，培养故宫学方向的学生，培养故宫学研究的后备力量，是故宫学足以成为学科，甚至是已经成为学科的确证。

八 故宫学：从学术自发到学术自觉

2005年2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该报记者卫庶对郑欣淼院长的采访记，题为《故宫学：从自发到自觉》。记者的第一个问题是：今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80周年，我们注意到，近年来您一直在力倡故宫学，请问提出并确立故宫学的主要想法是什么？

郑欣淼院长回答说：

¹ 见故宫博物院《文博科研要情》2012年第2期。

² 见故宫博物院《文博科研要情》2012年第2期。

故宫学，是客观存在并已有很好基础的一门学科。80年来，故宫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成果不断涌现，但从故宫本身的地位、作用及研究状况看，故宫研究还需要提升、创新、突破。因此，有必要提出并加强故宫学的建设，即明确故宫学是一门学科。80年来的故宫学术研究无疑多属故宫学研究，但尚处于学科发展的自发阶段。一门学科的建立，不仅要有深广的研究领域，还必须以一定的研究成果为基础，这是学科形成、发展的必要过程。故宫博物院成立80年之际明确提出故宫学学科建设问题，符合学科发展的规律。故宫研究的材料十分丰富，但以前的研究是在不同领域中的进行的，故宫学则要求把这些基础研究整合起来，统一起来。这是故宫研究不断深入的必然要求。显然，没有长达80年的故宫研究的实践和成果，就不可能明确提出故宫学概念，而提出并确立故宫学，将使故宫学研究进入自觉阶段，从整体上提高研究水平¹。

三个月后，2005年5月27日，郑欣森院长在故宫博物院第1期学术讲座的讲演中进一步阐述了故宫学从自发到自觉的思考：

以前有没有故宫学？我认为是有的，但属于自发阶段。我们现在明确提出故宫学，说明故宫学的研究进入新的阶段，即自觉的阶段。鲁迅先生1927年提出，曹丕的时代即魏晋时代是中国文学从自发到自觉的时代。魏晋时期出现了中国文学理论史上几部有名的典籍，有了基础、有了实践才有理论的概括，有了新的理论就能对以前文学的成败得失进行评判，为以后的发展指出路向。同样，故宫博物院没有80年的历史，没有80年的学术研究，没有这些成果和基础，突然提出一个故宫学是不可能的。正因为有了80年的研究，故宫学研究已到一关键时期，故宫的研究能不能迈开大步有新的发展，需要明确它的学科地位，重视它的建设。有了80年，水到渠成，你才可能提出故宫学；你如果不提出，坐失良机，对以后的发展就可能带来影响。这是一个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问题。故宫学提出是必然的，至于谁提出，则具有偶然性。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机遇，就是80年的建院纪念，80年确实值得我们回顾、总结。当然对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文学的自觉时代”始于何时，现在也有不同的观点，这是学术问题，但我却受鲁迅先生这一提法的启发，认为故宫学正处于从自发到自觉的重要时期²。

故宫学是一棵大树，其根底、其力量在故宫学术研究80年的累积，在数千年民族文化的累积。这是郑欣森先生反复强调的，也是他倡导故宫学的原动力所在，建设故宫学的信心所在。

正是基于这样的根底，他才能以舍我其谁的胆识、敏锐与担当，底气十足地、充满理性地、不失时机地提出和致力于创建故宫学。理性地致力于理论体系的构建是学术研究进入“自觉时代”的标志。以身为院长的郑欣森先生提出和倡导故宫学为标志，以故宫博物院建院80年为契机，故宫学术便进入“故宫研究的自

1 《守望经典——郑欣森谈故宫》，第58页，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

2 《故宫与故宫学》，第332页，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

觉时代”，故宫研究便进入一个从个人自发到集体自觉的学术研究的新时期。而故宫学学理被社会、被学界迅速而广泛的认可，即被外部世界的认可，则是故宫学术研究进入自觉时代的更为重要的标志。

《人民日报》发表《故宫学：从自发到自觉》后，随即被《新华文摘》(2005年第17期)、《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年6月14日)转载。在此前后，《新华文摘》陆续转载了郑欣森先生有关故宫学的论文4篇：《厥功其伟，其德永馨——纪念马衡先生逝世50周年》，发表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2期，《新华文摘》2005年第14期转载；《故宫博物院80年》，发表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6期，《新华文摘》2006年第5期转载；《关于故宫“盗宝案”》，发表于《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9期，《新华文摘》2007年第24期转载；《故宫藏传佛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发表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5期，《新华文摘》2008年第1期转载。另有《沈从文与故宫博物院》一篇，发表于《故宫学刊》2005年总第2期，《新文学史料》2006年第1期转载。以如此重要的刊物，在如此集中的时段里，如此集中地转载同一位作者关于同一个学术问题的学术论著，这在学术界是极为罕见的现象，堪称“郑欣森现象”，当然也是“故宫学现象”，“故宫学效应”。

2009年，北京故宫博物院与台北故宫博物院两岸院长实现首次互访期间，台北故宫博物院周功鑫院长对故宫学理论予以积极认同。2010年，在故宫学研究现状与未来发展座谈会上，南京博物院龚良院长表达了希望在以南京推广故宫学理念、加强故宫学研究作为故宫学延展的愿望。龚良院长认为南京有研究故宫学的基础和资源，他从在南京进行故宫学研究的意义、范畴、内容、队伍、方法、成果展望六个方面畅谈了南京故宫学研究的构想。沈阳故宫博物院武斌院长畅谈了沈阳故宫研究实践故宫学的成果，认为故宫学对博物馆的学术和理论建设的启发价值在于从技术性研究转向理论性研究，从实证性研究转向文化性研究，从文物本体研究转向博物馆社会角色研究¹。

自称对历史、文物、考古、古建筑是完全的门外汉的孙皓先生，读了郑欣森的《故宫与故宫学》一书后，撰文论述故宫学学科、学科体系，并提出故宫学学科建设的具体意见：组织编写一批故宫学的基本著作，建立和发展故宫学研究的社会机构，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和扩大故宫学的研究队伍，在海内外广泛开展与故宫学有关的学术交流活动的文章还特别提出历史上沈从文先生与故宫博物院的合作模式值得借鉴，可由此开创一种故宫学研究的独特方式²。

《云梦学刊》主编余三定先生在题为《故宫学：故宫研究的新阶段》的对郑欣森的访谈中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近十年来，他的主要精力用于对中国当代学术史的研究，他担任主编的《云梦学刊》开辟有当代学术史研究专栏，他们建有湖南省“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基地”，关注和研究当代重要的学术现象、学术思潮、学术流变、学术成果和重要学人。他说他从2004年以来，从《人民日报》(主要是学术动态版)、《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文汇报》、《新民晚报》、《故宫博物院院刊》、《故宫学刊》等重要学术媒体读到郑欣森先生有关故宫学的论文和报导，并且知道郑欣森先生先后应邀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等院校就故宫学做演讲，他认为故宫学的提出是当代学术界的重要现象和收获，而且故宫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重要成果，郑欣森是当代重要学人，所以他把郑欣森和郑欣森提出的故宫学作为他的研究对象，作为当代学术史

1 见《故宫博物院科研工作简报》2010年第2期。

2 《故宫学门外谈——〈故宫与故宫学〉读后》，《故宫学刊》，2010年，总第6期。

研究的对象¹。

由对对象的研究到成为被研究的对象，虽然只是初步的，但仍然可以看作是故宫学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

我在故宫博物院建院80年时，从大历史的视角总结和展望故宫学术研究时说过，从故宫博物院作为一个非常突出的具有多方面文化因素的综合性博物馆来讲，从大学术研究概念来讲，对明清两代的宫廷文化、宫廷艺术的研究，以至对两千多年、三千多年历史的帝制、王朝、宫廷文化、宫廷艺术的研究，需要具有学术上的整体性、体系性、系列性，即要从个人的自发自觉向整体的自发自觉发展。这是个努力的目标。要向这个目标进发，要提出一个响亮的学术口号，要举起一面鲜明的在学术界高高飘扬的学术旗帜，要有一个明确的学术概念，要有一个切实的学术发展规划，要有一个行之有效的科研项目课题制度，一个及时发布和传播研究成果的学术平台，一个开放而富有创见的人才培养方向，当然还要有一个严谨活跃的学术氛围，如此，才可能真正实现从个人发展到整体齐头并进的转变过程。郑欣淼院长故宫学的及时提出，是对历史发展给故宫博物院提出的要求的一个明确、响亮、集中的回应；故宫学作为整合故宫学术研究的指导性理论，从整体的宏大的视野上明确了21世纪故宫博物院的学术担当或者学术使命、学术责任是什么，学术成果是什么，学术人才是什么这样一些关乎全局与未来的重大问题，给了故宫研究一个非常明确的历史坐标；因这坐标，故宫学术研究的指导理论就建立在中国大文化、大历史背景之下，乃至人类文化、世界文化之大背景下了。

我特别强调：我们必须承认任何历史研究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昔日的皇宫变成今日的博物院，不止包容了重大的历史内容，更具有由传统文化转向现代文化的意义。对文化历史而言，应具有清醒自觉的反省意识与批判精神。应有科学的审美观。当代人的研究应有鲜明的现代理性和自主意识。一个明白的事实是，从整体上说，长达数千年的帝制是被后来的社会制度否定的，那么如何对待漫长的帝制皇权所制约和影响下的历史、经济、文化、艺术，不能没有当代人应有的文化理性。何况我们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帝制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枢。

我对故宫研究的学术路线作了这样的描述：我们所做的研究是处在中国重大历史转型期的回望。处理好科学的传承观是最值得我们注意和深思的地方。这种思考应渗透在故宫学术研究的所有领域里。我们是否可以作这样的描述：15世纪到19世纪的紫禁城——20世纪的故宫博物院——21世纪的“故宫学”。这是一个历史发展的线性过程。阶段性的时间与空间表述包含了所有的内容——用时代的眼光回顾以往的时代²。

回顾故宫学走过的十年路程，我想，我那时的感觉和展望是对的；并相信一定会继续被故宫学今后的发展所证明；并相信在以故宫为参照标志的帝制政体、帝制文化、帝制学术的现代转型的大历史趋势下，故宫学研究一定会由学术自发经学术自觉而达学术自信、自强之境。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

(责任编辑：陶晓姗)

1 见《学术界》2009年第1期。

2 以上见《故宫学术研究——站在中国重大历史文化转型期的回望》，《紫禁城》2005年第5期。